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

## 第一辑

## 目 录

- 
- 前言 -
- ( 1 ) 解放前乌拉特西公旗贵族喇嘛之间的  
权利斗争史  
..... 华吉日戈撰写  
张世杰协助整理
- 
- ( 58 ) 河套解放前后的见闻  
..... 董炎炳
- ( 88 ) 忆原米仓县“九·一九”起义  
..... 吕济世
- ( 94 ) 在“绥西行署”期间的点滴见闻  
..... 董玉奇
- ( 106 ) 对傅作义在河套时期组建动委会和  
实行新县制的回忆  
..... 苏希贤
-

- ( 124 ) 伊斯兰教在陕北的传播与发展  
.....王维孝、马生林
- ( 129 ) ✓ 河套基督教会组织发展概况  
.....聂思聪

- 
- ( 136 ) 临河李记“德和泉”的兴败  
.....杨自立 张美欣,  
刘培荣、梁杰走访  
刘培荣整理

- 
- ( 162 ) 巴盟文史资料征集撰写参考纲目  
...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 ( 170 ) 封面：阴山岩画说明
-

# 解放前乌拉特西公旗 贵族喇嘛之间的权利斗争史

华吉日戈 撰写

张世杰协助整理

乌拉特西公旗（现称前旗），过去，原系乌拉特三公旗的组成部分。其地理位置大体上（因乌拉特三公旗之间向未明确划分过界限，故称大体上）在绥远土默特旗之西，伊盟杭锦旗之东，南隔黄河与达拉特旗相望，北与乌拉特中公旗为邻。

境内草场辽阔，山脉纵横。闻名全国的乌拉山横亘全境。山势巍峨高耸云霄，天然生长着的松、柏、杨、桦等树木，葱葱笼笼覆盖着整个山区。由于树木茂盛，形成了一个绿草如茵，红花似锦的大牧场，负载着千万只牲畜的繁殖生息。除此以外，山上还出产党参、黄芪等多种名贵药材，青羊、梅花鹿等各种稀有野生动物。

绕境还有黄河水流过，它灌溉着乌拉山南边东至图和木湖、塔本布浪，南至苏木吐，桑布黄盖，西至莫利套勒盖、苏海滩、查干套海、毛力其格哈，北至山脚附近等大片牧场。在乌拉山以北，尚有明安川、余太、苏都伦呼都格、千里庙等广阔牧场。所有这些牧场都是水草丰盛，牛羊肥壮，对发展畜牧业具有无比的优越条件。

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乌拉特西公旗，气候温和，风景宜人，在这样优美环境里生活着的广大牧民群众，按理说，应该是六畜兴旺，农业兴隆，生活美满，吉祥如意地过日子才对。但实际却不然。由于蒙古人民头上世世代代压着封建势力与宗教统治这两座大山，因此面对着山青水秀，畜壮膘肥的良好自然条件，也无补于改变牧民大众所处的贫困地位。特别是在进入三十年代里，西公旗上层人物贵族、喇嘛之间，经常不断地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更使广大牧民处境日坏，生活也每况愈下了。

王公、喇嘛原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以统治蒙古人民的政治支柱。统治者只有通过王

公、喇嘛才能实现其统治内蒙古人民的罪恶目的。但他们利用王公、喇嘛的方法多种多样，变换莫测。有时拉拢，有时挑拨；有时分而治之，有时以夷制夷等等。请看三十年代发生在西公旗上层人物之间争权夺利斗争的闹剧中，背后都有他们在作怪。

所谓乌拉特三公旗者，原是这三个旗的统治者，在清朝时代同被皇帝封为“公”爵。而西公旗的统治者被授为“镇国公”，因位于乌拉特之西，所以称为西公旗。本文中提到的王公，实乃对蒙旗统治者笼统的称呼，在西公旗有“公”无“王”应予说明。

在蒙旗掌握旗政者称为扎萨克，他是全旗权力的主宰者，为一旗之长。在三十年代，西公旗政府（衙门）的组织情况大致如下：旗扎萨克下，设有左右两个协理（吐斯拉格其），协助扎萨克处理事务，称为东官府，西官府。在协理之下，设一个总管管理旗务。总管之下，设有两个梅林章京；三个参领，分别管理地方事务。当时全旗划分为十二个苏木。两个梅林章京各管六个苏木；三个参领各管四个苏

木。苏木设有苏木章盖，具体办理地方行政事项。旗府设有军队，用以维护治安。

在宗教方面，全旗共有寺庙二十四座。在这些寺庙之上有一个旗庙。旗庙对其它寺庙有宗教上的领导权。当时西公旗的旗庙为梅力更庙。该庙建立在哈叶胡同北山口旁，是一座具有西藏建筑形式的、富丽堂皇的大庙宇。当时庙上共有七个活佛喇嘛，其中以梅力更活佛的地位为最高。

各寺庙都有自己的土地和畜群。所有这些庙产，都由活佛喇嘛来支配，这已成为活佛们的特权，甚至连旗扎萨克对之也无权插手或过问。

宗教是吗啡剂，是鸦片烟，它是套在蒙古人民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千百年来，蒙古民族由于信仰喇嘛教，不仅造成了人民的愚昧落后，也更招致了民族人口的急剧下降。

总之，解放前蒙古民族“贫、病、愚”的主要根源，都是和封建统治与宗教信仰分不开的。在西公旗来说，又加上贵族与喇嘛之间的无休止地权利斗争，以及长城自毁，引狼入

室的自杀作法，更造成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 二

在二十年代时期，执掌西公旗旗政充当扎萨克的原为贺喜格德力格尔。可惜他有福无寿，不幸早亡。贺喜格德力格尔生前无子，因此，在他死后，旗扎萨克的职权由文书协理额尔和道尔吉（额宝斋）代行了几年。

及至二十年代中期，额尔和道尔吉觉得不能再长期代理扎萨克职权了，于是他就开始在全旗贵族台吉中物色扎萨克人选。经过精心选拔，终于物色到了在公庙子出家当喇嘛的台吉石拉布多尔济，有资格充当旗扎萨克。在人员选定后，经报请乌兰察布盟盟长和绥远省政府批准，任命石拉布多尔济为乌拉特西公旗扎萨克。执掌旗政。

石拉布多尔济在受命后，立即还俗，然后就任扎萨克职位，执掌了旗政。石拉布多尔济本为“贝子”爵，后来在一些文件中有时称他为“石王”。这是一些人不了解蒙旗情况，误以为凡当旗扎萨克者一定都是王爷，因此，随

便给石拉布多尔济加以“王”称，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石拉布多尔济执政后，马上娶了一妻，名叫孟根其其格。但婚后数年，女人并未生育。为了后代子嗣计，他又在达拉特旗娶来名叫花儿的女人为次妻。自从花儿进门以后，石拉布多尔济厌旧喜新，与花儿打的火热，反而逐渐地疏远了原配夫人。不久，其大妻忧郁而亡。从此，石拉布多尔济无所顾忌，每天与花儿吃喝玩乐，不理旗政，以致大权旁落在一些旗府官员手里（主要落在额尔和道尔吉手里，他把持旗政前后约三十年）。他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从此，旗内人民的生活更陷于困境。

自从石拉布多尔济登上旗扎萨克的宝座后，他不仅沉湎于酒色，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同时，并又征集工匠、人夫、大兴土木，在乌拉山敦达高勒（东大沟）修建起大批宫殿式的房屋。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奴隶当差制。令全部奴隶分期分批的无偿的来衙门服劳役。如背柴、放牧、挤奶、背水、做饭等等。每月轮换，定为常规。为了保护他和他全家的身家性



命，他特地在牧民中选出了身强力壮的青年二十多人，组成卫队，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

石拉布多尔济原因无子才娶花儿为次妻，但几年来，花儿宛如石田一块，并未开花结果，没有给石拉布多尔济生出子孙后代来。鉴于此种情况，在属下们的劝告下，石拉布多尔济又娶了第三房女人。

这个女人汉名叫奇俊峰，蒙名色布勒玛。其母原为阿拉善旗人，后嫁到达拉特旗，人称为阿拉善夫人。奇俊峰为其养女，系达拉特旗人，其娘家住在五原西边的西仓。从奇俊峰进门后，石拉布多尔济一反过去喜新厌旧的故态，他仍然亲近花儿，对奇俊峰感情淡薄，关系疏远。致使奇俊峰不得不常期住在娘家。一直到石拉布多尔济临死前，才回到石家来。

尽管石拉布多尔济娶妻三人，但都未曾生育。后来又在一九三六年间，娶了一个乃玛斤为四妻，也没生养。当年秋，石拉布多尔济就逝世了。

### 三

当时，乌拉特西公旗的形势是，虽然在名

义上石拉布多尔济为旗扎萨克，是一旗之长，但实际上他却不能在全旗范围内行使他的全部权力。原因是：官府和寺庙的势力已经强大，形成了各据一方，进而与石拉布多尔济相抗衡的地步。这些官府、寺庙都拥有大量土地，进行收税吃租。在府、庙里，他们也设官分职，如任命德木其、控热巴（寺庙的管事、保管）、管家、会计等职务，为他们经营管理府、庙大事。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官府、寺庙都从所属奴隶中抽出壮丁，编成军队，用以保卫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

当时，全旗势力最大的官府、寺庙有三个，这就是：额尔和道尔吉官府，梅力更庙活佛喇嘛，公庙子大喇嘛达格丹（亦叫迪克丹）。寺庙都住在乌拉山南面的山脚下。由郭达高勒往西二十公里处为大喇嘛达格丹居住的呼之宝力格，往东二十五公里处为梅力更活佛居住的梅力更沟口的梅力更庙。至于官府额尔和道尔吉则住在三湖河畔。

梅力更庙在清王朝时期，曾被皇帝赐名为“兴旺宗教庙”。因此，这座寺庙在全旗声望

最大。在宗教界中也享有特殊的待遇，及至传到第八代活佛——也就是最后一代活佛时，寺庙的土地、牲畜数已达到很可观的数字，而庙里建立起来的军队和装备也比较精良。

由于官府和寺庙的势力逐渐强大，旗扎萨克石拉布多尔济的权势不断地受到挑战，终于发展成错综复杂的权利斗争，并进而形成火拼的局面。致使旗政日非，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现象上看，矛盾的起因很多，但引起石拉布多尔济与官府、喇嘛之间发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一个权利问题。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按照西公旗惯例，寺庙财产有自主权，旗扎萨克是不能向寺庙土地、畜群收税的。可是当时梅力更庙拥有土地八百顷，牲畜若干群。石拉布多尔济对于这些庙产垂涎欲滴，眼里冒火，竟然提出了违犯惯例的要求。当时他要求从梅力更庙的收入中征税。对此，梅力更活佛严加拒绝，从而双方闹翻了脸，后来竟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斗争局势，结束了以前封建贵族与寺庙喇嘛的和平友好关系。

(二) 达格丹大喇嘛是石拉布多尔济的堂叔父。达格丹之亲兄达汗官府死后，其子巴图巴雅尔充当右协理，但有名无实，没有实权。达格丹大喇嘛深切希望西公旗扎萨克的职位掌握在自己亲侄儿巴图巴雅尔之手，但经过暗中努力，始终未能如愿，因此，他把石拉布多尔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过达格丹准备推翻石拉布多尔济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由于采取的方法十分隐蔽，所以矛盾尚未公开化。

(三) 额尔和道尔吉与石拉布多尔济是导致矛盾公开化的肇事者。主要原因是由于额尔和道尔吉的长子曼头与花儿私通。详情如下：

一九三〇年初，额尔和道尔吉居住在三湖河畔自己的家中，他除了靠收土地租税过活外，自己也养了一群牛，由于他身为官府，身边也有几十名卫兵保护，由其长子曼头率领。

在三湖河畔有石拉布多尔济的敖特尔（流动放牧的倒场地），距额尔和道尔吉住处才一里来路，互相都能看得见。每年秋天石拉布多尔济都到敖特尔里来。这年他又带上花儿夫人

· 住在敖特尔里。

· 此时，曼头每天都在三湖河畔游荡，表面上在打鸟，实际上他是在打花儿的主意。花儿经常也到三湖河边出游，与曼头常常会面。久之，男有情，女有意，两人遂定了私约。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花儿忽然打发丫环来叫曼头到她家。曼头喜出望外，立即穿上大衣，佩上手枪走去与花儿会面。正当他们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的时候，不料好事多磨，在午夜时分，忽然来了几个人，从花儿房中拖走了曼头，并没收了他的手枪和外衣，把他关在一间空房中。幸亏门上没有上锁，因此，在天亮之前，曼头安然逃回了家中。

· 这天，石拉布多尔济正在去梅力更庙拜佛的途中住宿。次日清早正准备出发之际，忽然，看见府内的管事人员巴图乌力吉等人跪在面前，手捧曼头的枪支和衣服，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当时石拉布多尔济并未表示态度，依然带上从人去梅力更庙拜佛去了。及至由梅力更庙归来后，他唯一的措施是：把原捕获曼头的人加以痛打，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借以自慰。

#### 四

花儿夫人与曼头私通事被揭露后，奇怪的是，此事是乎无人过问。即石拉布多尔济并没有责备其妻的不忠；而协理额尔和道尔吉也未对其子的犯上行为作任何处理。表面上看来，非常平静，此事似乎不了了之。其实不然，背后正孕育着一场杀机，最后终于爆发了导致全旗分裂与垮台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相残杀。

为什么石拉布多尔济没有立即处理曼头呢？这是因为额尔和道尔吉身边备有重兵，并由曼头率领，如仓猝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如不惩罚曼头，胸中之气又十分难耐。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来，他马上派人告诉额尔和道尔吉，让他立即交出枪五十支，马五十匹，用以赎曼头之罪。实际上他打算在额尔和道尔吉交出枪马后再抓曼头治罪。

这时曼头早已逃奔外地躲避去了，只有其父额尔和道尔吉在家。当他听到石拉布多尔济提出的要求后，感到这是一个卡脖子的阴谋诡

计，对之气愤异常！当即回答：“关于花儿与曼头之事，他们双方都有责任；要处罚的话，男女两方都要受到处罚才是。现在抛开花儿不问，单独向我要枪、要马，这是不公平的，我万难接受！”双方僵持，互不让步。从此，石拉布多尔济与额尔和道尔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发展到了兵戎相见。

在石拉布多尔济要求被拒后，他并不甘心于失败，随即在旗府内召集军政官员色林保、沙格得尔、满海、斯日古楞等开会，商讨对策。会上有人提出：“必须给额尔和道尔吉以武力打击！”另有人提出：“如果用兵力打击额尔和道尔吉的话，万一梅力更活佛和达格丹大喇嘛等三方面的军事联合起来向我反攻，那我们所处的地位将十分不利！”最后有人提议说：“我们的扎萨克是一旗之长，能够统率全旗军队。我们应该一方面征调全旗军队助战；另一方面包头城防司令王靖国与扎萨克关系很好，还可以请包头驻军作我们的后盾，以压倒对方”。等等。

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各方都在秣马厉

兵，进行备战。到一九三三年末，双方部队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石拉布多尔济首战告捷，他们不仅打了胜仗，而且还俘获了额尔和道尔吉的牛马群，成为胜利者。

额尔和道尔吉在战斗失利后，立即重整军备，进行报复。他一方面把妻子儿女送到公庙子达格丹大喇嘛府内居住；然后，他会同达格丹大喇嘛一同去巴图哈拉格（百灵庙）请求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给予支援。

一九三五年夏天，包头城防司令王靖国派步兵两个团协助石拉布多尔济来西公旗打内战。王靖国原为阎锡山的亲信人物，曾当过十九军军长。其后阎锡山派他来后套开垦蒙古土地，称为垦务督办，此时正任包头城防司令，兼指挥后套一带的兵力。由于王靖国派兵助战，这大大的鼓舞了石拉布多尔济的士气。他立即组织起全旗蒙汉部队与王部两团协同作战，进攻以公庙子为基地的达格丹大喇嘛府，并准备趁机全部歼灭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的兵力。



当时大喇嘛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的兵力相加起来还不到一百人。由于兵力悬殊，只能守，不能攻。尽管石拉布多尔济的部队不断用机关枪、迫击炮射向大喇嘛府，但在大喇嘛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的指挥下，士兵们都死守阵地，一直继续抵抗了三天三夜。达格丹等为了坚定士兵必胜的信念，还搞了一些迷信动作，如请来大坝庙的神官喇嘛高日德木进行作法，以诅咒敌人的早日灭亡。

在战斗进行的第三天晚上，大喇嘛府遭受的炮弹越来越多，此时，妇女小孩们哭喊连天，失去了信赖，就连指挥战斗的大喇嘛和额尔和道尔吉也感到胆战心惊，不敢再战。那个依靠法术专门哄人的高日德木，也早已逃得无踪无影了。

在这危急关头，达格丹大喇嘛和额尔和道尔吉决定立即逃走，否则就要遭受覆灭之灾。于是他们带领兵丁、家属、骑马赶骡，拼命冲出包围，向东北方向逃去。一进公路，他们就往西拐，顺西山咀的边上向西走，直奔杭锦旗却木楚克的住所而去。此时他们的部下奔走逃

亡，只有少数人跟他们来到却木楚克家中。那个神官喇嘛，也在逃走之中失足落水，一命呜呼了。

在这次战斗中，石拉布多尔济和他请来助战的王靖国两团兵是胜利者，他们在大喇嘛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逃走之后，乘胜攻入大喇嘛府，大肆抢掠，搜刮金银。最后把所有的畜群，都作为胜利品一群一群的赶回去了。

这次战斗尽管打的十分激烈，但双方部队死亡的人数并不多。

## 五

却木楚克家住杭锦旗塔本萨拉（五岔沟），原是杭锦旗里有名的大剥削者。当时他任营长职务，驻在杭锦旗东特布地方。大喇嘛他们兵败来投后，他愉快地收容了这些失败者。大喇嘛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在安顿好家小及残兵败将后，又双双东去百灵庙，向德穆楚克栋鲁普请求支援。

这次德穆楚克栋鲁普答应了大喇嘛他们的请求，除拨给他们步枪五十支、子弹若干发以

外，又派出以连长霍仁格为首的一连兵力给予支援，这一连兵约有百十人，都是从察右旗招募来的。随同这个连一同来的尚有蒙古自治政府官员十来人（大部分是汉族），并带有电台一部，经常与百灵庙取得联系。大喇嘛他们返旗后，将这连兵力安排驻在梅力更庙上，然后回到呼宝力格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准备伺机再战。

在大喇嘛他们失败的时候，却木楚克确实对他们帮了大忙，恩重如山，无以为报，额尔和道尔吉情愿将自己唯一的女儿敖特恒查干嫁与却木楚克之子为妻。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近一层，而额尔和道尔吉的家属由此更得到却木楚克的妥善安置。为安全起见，却木楚克把他们送往杭锦旗最西部的一个偏僻地方去住。额尔和道尔吉在安排好家属后，又立即率领长子曼头，三子巴亚尔图一块到梅力更庙会同霍仁格征兵备战，准备大干一场。

蒙古军进驻梅力更庙，构成了对石拉布多尔济的更大威胁。为对抗计，石拉布多尔济又从包头王靖国处请来三个连的兵力，分别驻在

包力召海（汉名堡子湾），巴音宝力格等地方。这时双方已完全进入对峙的局面。

在这兄弟阋墙，引狼入室的情况下，乌拉特西公旗人民更加深深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仅出钱、出物，还得给交战者双方提供炮灰，以供他们自相残杀。此时，广大牧民情绪低落，生产下降，在精神状态方面，已经陷入麻木不仁的地步。

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曲，颇为人民所喜爱。大意是：

乌拉特西公旗哟，麻烦成堆。  
日后如何哟？谁能先知！  
树枝上落满了布谷鸟，  
领上咱子弟呀！上呀，上战场；  
树枝上落满了相思鸟，  
留下咱亲友呀！上呀，上战场。  
黄河岸上柳树在摆，  
望着那恋人呀！上呀，上战场。  
绿湖边上鸿雁在叫，  
离开那家乡呀！上呀，上战场。  
柳树林的雀鸟自由飞翔，

我们老百姓呀，有谁来救？

不仅老百姓生活如此，就连额尔和道尔吉亲生的唯一女儿敖特恒查干也未逃出当作政治牺牲品的厄运。敖特恒查干原本是一个善良、美丽、温厚、和蔼的好姑娘，但她的父亲却把她当作报恩的礼物，嫁与却木楚克之子为妻。由于男女双方没有爱情基础，以致造成婚后夫妻反睦，公婆虐待，敖特恒查干每日都处在以泪洗面的忧郁、悲伤、烦闷、孤独的生活中。日久生病，不久病魔便夺走了她的生命。

敖特恒查干生前深深地怀念家乡，曾编一歌，以寄乡思。歌词缠绵凄凉，委婉动人，大意是：

山川富饶哟，  
乌拉特地方。  
牛羊肥壮哟，  
老人的福气。  
阿爸要是问我哟，  
女儿在这里安好。  
绣起那灿烂的金莲花哟，  
献给亲爱的父亲。

额吉要是问我哟（额吉是母亲），  
女儿在这里安好。  
绣起那美丽的牡丹花哟，  
献给亲爱的母亲。  
我从苍翠的乌拉山脚下，  
来到了荒凉的杭锦旗，  
思念亲爱的父母哟，  
唱起我心中的歌曲。  
敖特恒查干儿哟！  
我想念家乡西公旗。  
今年要是回不了家哟，  
只能在此地永息！

## 六

一九三六年，这一年对乌拉特西公旗说来是一个多事之年。这年春天，住在梅力更庙的梅力更活佛、额尔和道尔吉官府和住在呼和宝力格的达格丹大喇嘛都抓紧时机，在附近各苏木征兵，以充实力量，准备伺机夹攻石拉布多尔济。驻在梅力更庙上那连蒙古军，也在连长霍仁格指挥之下进行备战。霍仁格为人残暴，动

不动就鞭挞士兵，性格极坏。

一九三六年农历七月间，在一个浓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这时天空还在滴着雨点，额尔和道尔吉协理和梅力更活佛紧急集合起他们所有的兵丁约一百二十多人，命令额尔和道尔吉部由沙日门率领，梅力更活佛部由洪克尔率领，让他们冒雨率领向西奔袭。梅力更庙则由霍仁格连守护。

原来这两支冒雨奔袭的队伍，今夜是执行捉拿石拉布多尔济得力助手满海的任务。满海当时身为旗府总管，是石拉布多尔济身边出谋划策的军师谋士，也是官府、喇嘛的死硬对头，因此，官府、喇嘛们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部队从梅力更庙出发后，一直朝西走，及至走到乌宝力格南边哈硕敖包附近，就拐入一片玉米地里，士兵都下马步行到乌力吉沟口的东边。当时由沙日门指挥将马匹放在此处。让大部分士兵步行去乌力吉沟口捉拿满海。

在旗内经常发生内战的情况下，人人都感到自危。身为旗府总管的满海，也时刻提防着

敌人的暗算，因此，他家也住着十来个士兵，用以自卫。是夜站在山头的岗哨正在抱枪打盹之际，突然遭到沙日门率领之兵的偷袭。当哨兵被俘后，沙日门命令他充当捉拿满海的向导。

到了满海家后，他们很顺利地收缴了卫兵的武器，并未遇到任何抵抗。及至进行清查被俘人员时，才发现并没有满海其人。原来满海此时已去后套，不在家中，故未遇险。未捉到满海不好回去交差，于是沙日门决定捉拿满海之弟官布，以便回去报帐。

官布家住在尔计沟里，与满海家相距二里之遥，家中也驻有军队自卫。沙日门兵分两路，分别占领东西两座山头，准备以泰山压顶之势袭击官布。在天色黎明时分，两路人马都已爬到山顶。此时西路登山士兵不慎登落一块石头，滚到山下，恰被一早起大便的牧民所发现。他抬头一看，满山是兵，便知大事不好，提上裤子赶忙回去报告。及至走到院内，看见一个穿红袄，秃头的大胖子早已发现敌人，正在拿枪向东西两个山头射击。双方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战，那个秃头胖子不见了，驻在官布



家东厢房的卫兵们，也从窗口把枪扔了出来，全部举手投降了。在打扫战场中，才发现那个秃头胖子就是官布，其妻也死在官布身后。因为枪声一响，其妻惊慌失措，紧紧拉住官布的后衣不放，结果与官布一同中弹而死。

## 七

按“兵贵神速”的要求来讲，沙日门在消灭官布之后，应立即进军三湖河，在石拉布多尔济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是能够一举消灭敌人，获得全胜的。但沙日门目光短浅，虑不及此，竟在吞云吐雾中，贻误了战机。结果功败垂成，反而造成了大喇嘛达格丹祖孙三代被杀的惨剧。

原来沙日门在消灭官布一家之后，又回到乌力吉南边的村庄里休息兵马。进村后，他除了下令设岗放哨外，马上点着烟灯，吸起大烟来了，在他迷迷糊糊之中，早已把消灭石拉布多尔济的任务忘到九霄云外。等到次日傍晚率兵出发时，时间早已过了两天一夜，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包头驻军王靖国已派

出大批军队占领了梅力更庙，赶走了梅力更活佛和蒙古兵，并断了沙日门他们的归路。

原来沙日门杀害官布一家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石拉布多尔济的耳中。他听到噩耗之后，心中万分惊恐，马上带上护兵连夜去包头求援。对此，王靖国非常慷慨，立即答应派一师兵力帮助，并约定采用东西夹击的办法，以消灭官府和寺庙的势力。这就是由包头出兵向西攻，由五原出兵向东进。

当沙日门在听到王靖国出兵助战的消息后，吓的呆若木鸡，他不敢西进，立即返师。在他们走到东乌宝力格深山里的时候，迎面来了被王靖国部队赶出来的霍仁格的一连蒙古兵，此时，沙日门感到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好率部会同霍仁格一同去百灵庙，加入到蒙古军中。

自沙日门走后，王靖国布置的东西夹击计划，已在步步紧逼，厄运首先降落在大喇嘛达格丹头上，因为夹击部队从东西两方会合在呼和宝力格，大喇嘛达格丹府是他们进攻的重点。大敌当前，走为上计。此时大喇嘛达格丹

除命令几十个士兵前去抵挡头阵外，他自己带上全家老小（其兄大汉官府的家属）觅路而逃。

当大喇嘛达格丹全家沿着呼和宝力格沟，走到山顶脑光朱鲁格一带的时候，正好遇上石拉布多尔济与王靖国部队的拦击。大喇嘛达格丹首先被人用枪打死，然后又割下了他的脑袋，接着又打死了躲在树后的达格丹的侄儿巴图巴雅尔。这时巴图巴雅尔十一岁的小儿子阿木尔楞贵正和一个老喇嘛在树林中躲藏，也被石拉布多尔济的部队搜寻出来，在他们脱下裤子验明是男孩后，当即连同老喇嘛一并枪决。在这场战斗中，大喇嘛达格丹祖孙三代惨遭杀害，而家产、畜群也被掠夺殆尽。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大喇嘛的家人衣食无着，只好过起了流浪生活。

## 八

呼和宝力格一仗，石拉布多尔济借助王靖国军队的力量大获全胜。此次战斗，打死了大喇嘛达格丹的祖孙三代，并割回大喇嘛的人头

充当胜利品，除了一大隐患。原来在这次战斗中，为了彻底消灭官府，喇嘛的势力，王靖国实际上共出动了两个师的兵力，东西夹击了大喇嘛。他除在包头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占领了梅力更庙，并扫荡在东部的一些官府、喇嘛的势力外，又特派五原驻军门师长，率领全师人马东下呼和浩特，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大喇嘛达格丹。

当胜利消息传到住在包头的石拉布多尔济的耳边时，他欣喜万分！认为大敌已除，太平无事，便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乡。

早在战斗开始之前，石拉布多尔济曾对其部下说：“在战斗中谁要能杀死大喇嘛达格丹，并将其人头带回来的，我必有重赏！”及至抵达家乡后，士兵巴图乌力吉带上大喇嘛的人头向石拉布多尔济请赏。自言大喇嘛是他打死的，人头是他亲自割下的，请按功授赏。

当石拉布多尔济看到巴图乌力吉从麻袋倒出来大喇嘛的人头后，只吓的魂飞魄散，目瞪口呆！厉声问道：“你拿这个来做什么？赶快把它丢在河里去”！这样，巴图乌力吉不但没

领到赏，反而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把大喇嘛的人头丢进了三湖河。

石拉布多尔济与大喇嘛达格丹本为一家，同属于贵族台吉，论辈份大喇嘛达格丹还是石拉布多尔济的堂叔。自从石拉布多尔济看见叔父达格丹的人头以后，由于害怕惊吓，神经上受了很大刺激，夜间经常在梦中惊醒，并不由自主地胡言乱语，逐渐形成了神经不正常，不能处理旗政，只得把旗里行政事务交给沙格德尔、色林保、满海斯日古楞、官其克巴自尔、那顺巴特尔等旗府高级官员去处理。他自己带上家属去包头治病。

石拉布多尔济原本是喇嘛出身，宗教信仰虔诚。自到包头治病后，除每日延医吃药外，在空闲的时间里，他都念《阿拉旦格日勒经》，乞求佛爷保佑长命百岁。尽管如此，但他的病并无好转，始终觉得大喇嘛达格丹的人头不停地在眼前晃来晃去，致使病情日重一日。

一日，他正在颂经之际，丫环突然从里屋出来说：“花儿夫人昏迷不醒，已失去了知觉”。石拉布多尔济赶紧进屋呼唤不应，及至

请来医生时，花儿夫人早已死去多时了。

花儿夫人死后，石拉布多尔济不胜悲伤，这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为了寄托他的哀思，对花儿夫人的殓殓和葬埋，花了不少钱，丧事办得极其体面。事毕，他立即返回三湖河的敖特尔，并从娘家叫回来奇俊峰夫人。

奇夫人回家后，发现石拉布多尔济身体消瘦，面目全非，并且性情古怪，精神萎靡不振，睡眠不好，饭量不佳，经常在夜间跳起高喊：“喇嘛拿着锁链来了！”府内管事人员到处烧香拜佛，请喇嘛念经，送替死鬼，等等，但都无济于事。终于在一九三六年秋季病死于家中。

## 九

尽管石拉布多尔济娶妻四人，但在他生前都没有生育出了女来，石拉布多尔济常为身后无人接替而心中烦闷。及至奇夫人归后不久，向府内管事人员透露，她已身怀有孕，以图博取石拉布多尔济的欢心。

一九三七年夏，居住在包头的奇夫人已届

临产之期。这时候在她身边的奴婢和色林保的女人，早已为奇夫人的生产作好了准备。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在午夜时分，奇夫人生出个男孩来，取名叫阿拉腾敖其尔，为石拉布多尔济留下了后代。奇夫人生子后，自己没有奶水，小孩靠牛奶养大。

关于这个孩子的来历，当时议论纷纷，如说“奇俊峰和石拉布多尔济结婚多年没有生男育女，为什么偏在石拉布多尔济身死之后生下孩子呢？”由于持这种疑问的人占大多数，因此，这事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

后来，奇夫人的一个贴身丫环向人透露了这事的秘密。她说：“奇夫人鉴于其夫无子，怕事业无人接替，财产无人继承，这将丧失石拉布多尔济家的产业、权势。因此，奇夫人在石拉布多尔济死后，即身缠棉花，装作怀孕，并早在石拉布多尔济临死前放出风声，以安人心。然后在第二年夏天，从包头（现东河区）西门内王大人巷姓田家抱来一新生男婴藏于密室，最后她才演出一场假生孩子的喜剧来”。云云。

据了解内情的人说：“此事主要由色林保之妻（即后文中郝游龙之母）协助完成的，她对奇夫人演出的假生子喜剧，出了大力，帮了大忙”。

流言不脛而走，几乎人人皆知，事关石拉布多尔济后人的袭爵接替问题，对此旗府官员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并将真象公布于众才对。但此时，他们正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此事置若罔闻，未加过问，以致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还是疑问。

## 十

自从呼 and 宝力格战斗失败后，额尔和道尔吉和梅力更活佛又逃到百灵庙。他们本打算请求德穆楚克栋鲁普出兵支援，及至到百灵庙以后，看到的，听到的，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使他们认识到，在国家多事之秋，乌拉特西公旗的事情也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民族的形势都有联系，只有国家安定，乌拉特西公旗才能有前途。从此，他们把个人之间的恩怨暂时搁置下来。



为此，额尔和道尔吉和梅力更活佛将他们由西公旗带来的兵马，计有：大喇嘛达格丹所属的官其格斯仁部，额尔和道尔吉所属的沙日门部，梅力更活佛属下的洪格尔部，全都交给了当时的蒙古军。然后，他们到了归绥市（呼和浩特）席里图召（庙）当寓公，在那里坐待形势的变化，以定以后的行止。

不久，便发生了百灵庙事件。这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傅作义所属的三个团进攻已成为蒙政会所在地的百灵庙。此时，蒙古军奋勇反抗，原乌拉特西公旗加入蒙古军的三部分人马也都参加了战斗。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及至进行到午夜时分，傅作义部队已占了绝对的优势，而蒙古军则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此时，由乌拉特西公旗来的官其格斯仁、沙日门、洪格尔三人，感到大事不妙。便率领三部人马，朝百灵庙东北的方向逃跑了。

中途，洪格尔感到前途无望，乃带领少数随从人员，离队逃往东公旗去了。官其格斯仁和沙日门二人率部一直逃到四子王旗的旗庙——锡喇木伦庙（大庙），才停止前进。随后

蒙古军也陆陆续续逃到此庙。当时德穆楚克栋鲁普命令他们原地待命，伺机反攻。因此，官其格斯仁和沙日门两部官兵也住在此庙未动。

不久，又来了王英所属的军队二千多人，还有日本顾问二十余人，也住在锡喇木伦庙上。他们每日乘汽车去百灵庙，晚上回来，据说与傅作义部队在作战。后来传出：“汉兵可能要叛变”的消息。对此，官其格斯仁、沙日门二部都加强了防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晚间，按宗教规定这天都要点佛灯，颂经，烧香，用以纪念佛祖宗喀巴。此夜锡喇木伦庙佛灯点点，烂若明星；经声朗朗，悠扬悦耳，吸引了许多游人（主要是士兵）。

夜半过后，当沙日门正在吞云吐雾大过烟瘾之际，突然听到了枪声。他到院里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后，又回到屋里吸烟。此时官其格斯仁也来到院中指挥作防御准备，逐渐枪声密集起来，只听寺庙各胡同中人马纷至沓来。有军号声，人喊声，呻吟声，狗叫声混杂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寺庙形成了一片混乱景象。

黑暗中，忽见院内一人跌倒，原来是连长官其格斡仁前额中弹当场死去。挨至天明以后，院内士兵都集中在喇嘛的柴（牛粪）房内躲避，惟不见沙日门前来。及至寻到蒙古包一看，他早中弹死亡多时了。当太阳露头时，叛兵枪口对准了柴房，全部士兵只好举手投降，其中只有额尔和道尔吉的三子巴雅尔图和乌力吉巴雅尔二人化装成喇嘛逃走。

原来这次叛变是王英部下旅长石玉山、金宪章二人发动的。他们在投降日寇后，屡吃败仗，感到前途无望，同时又受傅作义的策反，遂发动了叛变。叛变中杀了日本顾问二十多人，然后起义投奔了傅作义。

## 十一

乌拉特西公旗经过一九三六年三个月的互相残杀，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此时在乌拉特西公旗这座政治舞台上，反而显得十分平静。

奇俊峰夫人生下男孩后，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因此，她带了小阿哥阿拉腾敖其尔（阿哥系对王公儿子的尊称），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敦

达高勒。由于阿哥幼小不能亲政，于是奇夫人便把全旗军政大权统统揽到自己的手里。她为了取得贵族、官府的支持，便封官许愿，使一些人都得到了升官发财。如色林保、沙格德尔当了协理，其他人也都当了梅林章京，甲喇、参领等。（相当于科、局级和区乡级干部）。

住在归绥市，投靠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额尔和道尔吉协理，这时看到西公旗政局已变，人事全非，遂打动思乡之念，乃派亲信参事梅林章京太保到奇夫人处谈判，愿“捐弃前嫌，和平共处”。奇夫人表面上同意，但内心还有怀疑。于是她秘密派人去调查了解额尔和道尔吉的行为和动向。

正在双方猜疑、互不信任的时候，突然发生了额尔和道尔吉之子曼头、巴雅尔图等八人的被惨杀事件，致使刚出现的美好前景，顿时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巴代原为西公旗士兵，后编到蒙古军，在霍仁格手下当排长，驻防在固阳北边阿拉坦山一带。当时他想去杭锦旗叫回额尔和道尔吉的

长子曼头、三子巴雅尔图，让他们重新组织兵力，他本人也准备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拉回故乡来，一同大干一番。

思谋已定，他便请假带上三个随从回到家乡。在家里住了几天，曾到奇夫人府上作过客，而后带随从四人（由他家中跟来一人），渡过黄河奔杭锦旗而去。为了躲避途中防卡的盘查，他们绕了不少的路才到了曼头家。见面后，立即把事谈妥，并决定马上返回西公旗。

太阳落山时，他们由曼头家动身。这时曼头弟兄带上四个人（内有一名汉族）和巴代五个人，一行共十一个人，快马加鞭，一夜就跑了一百二三十里路，在天亮的时候，跑到了西山咀以西五、六十公里处的一个制鞋厂里休息。

次日傍晚，正当曼头他们备好马，准备出发之际，忽闻狗叫声，发现有人从东北方向徒步而来。岗哨问他，那人说：“我叫二黑眼，听说曼头来了，我想见他”。哨兵报告给曼头，曼头说这是熟人，立即请见。见面后，两人非常亲热，边谈话，边抽大烟，于是便停止

了上路。半夜时分，又来了一个找二黑眼的刘志全，也住到了鞋厂。

二黑眼这个人，过去曾经在曼头的部队里呆过，与曼头的关系不错，因此，曼头把他当成可靠的朋友。但此时这个家伙没有职业，又没有住处，到处流窜，现在聚集一些歹徒，以盗窃抢劫为生。

第二天黎明，曼头率队出发，行二、三里许，到了几座窑洞房前。此处为二黑眼落脚之处，里边住有十几个匪徒。曼头他们到时，这些匪徒正备好马准备出行。见曼头他们到来，当即表示欢迎，并互赠礼品，以示友好。然后，二黑眼表示愿随曼头一块走，匪徒中也有十个人愿走。这时，匪徒们都因分离而哭泣起来。最后仍有四、五个人留在原地。

曼头他们原来就有十一人，再加上二黑眼等十一人，这时他们已成了一支二十二人的队伍。当天他们走了五、六十公里，住到西山咀以南的一个村庄里。次日，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在日出时他们才上路。

途中，二黑眼一伙与曼头中的七个人走在

前头，曼头、巴代、宝日、劳莱班弟等四人因马走的慢落在后头。行至大坝庙的正南黄河对岸，离黄河沙边上哈仁戈太庙西北十里处的一个叫龙毛营的小村。村中仅有两处房屋，一处已破烂不堪。当曼头、巴代等四人走入村内时，刘志全迎上前来，说：“三少爷（指巴雅尔图）让我请你们到屋里暖一暖再走”。正当他们走到大门正南时，刘志全从紧贴在巴代马匹的左侧掏出手枪对准巴代的脸上，并抓住缰绳逼巴代下了马。在刘志全掏枪的同时，那些匪徒也一齐拔出手枪，对准曼头、宝日、劳莱班弟三人，逼他们下马。在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巴代、曼头、宝日三人只好都下马投降了，而劳莱班弟却拼命打马逃跑了。

原来捉劳莱班弟的人，只顾抢劳莱班弟胳膊上的步枪，并逼他下马，但没有抓住他的马嚼环。因此，劳莱班弟在放弃了步枪之后，就拼命地打马狂奔而逃，尽管身后枪弹如雨，但未伤着劳莱班弟。事后查看，劳莱班弟身穿的大衣打有窟窿几个，真可谓危险已极！

劳莱班弟脱险后，过了黄河走到玉兴店，

此地有奇夫人的部队驻防。他怕被驻军刁难截留，就哄驻军说：“曼头、巴代等人明天从这里经过，派我前来请你们给准备二十多人的吃喝和马料”。当时驻军答应了。之后，劳莱班弟马不停蹄地奔回了包头和固阳，并分别向额尔和道尔吉和霍仁格团长报告了受骗上当和遇难的经过。

额尔和道尔吉在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悲愤万分！除痛恨巴代多事外，又怀疑是奇俊峰、沙格德尔、色林保搦的鬼。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并探明儿子们的结果起见，他特派心腹随从华喇嘛化装成乞丐到出事地点去探听。

及至华喇嘛赶到出事地点时，只见有五具尸体横陈野外，但都没有头。经他仔细从尸体各方面来判断，才分清了谁和谁。随后他又深入地进行调查，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是：

二黑眼当时正处在投奔日本人或投奔五原驻军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正在不能决定之际，恰好曼头他们来了，这不啻从天上掉下来一分见面礼。于是坚定了他投奔五原驻军的



决心。那天他一共活捉了十个人，以后放走了两个人（汉族一人）。其余的八个人，除当场杀害五人外，剩下三人送交给五原驻军，也立即遭到杀害，并将人头悬挂城门示众。二黑眼因立了功，当即被五原驻军任命为团长。

## 十二

一九三七年末至一九三八年初，德穆楚克栋鲁普派一团蒙古兵驻在乌拉山以南的胜恒号（现在先锋公社一带）。任务是：一方面防备傅作义军队的进攻，再方面就近监视奇夫人的行动。

蒙古军白团长曾去奇夫人府中拜访数次。由于奇夫人寡居无偶，白团长很想娶奇夫人为妻。此事虽未明言，但奇夫人已觉察到白的心意。奇夫人此时母以子贵，身居未来扎萨克母亲的显赫地位，岂肯移尊下嫁，有失体统，但考虑此时在白团长的控制之下，不得不虚与委蛇。不过她暗中与协理沙格德尔商定，她们母子伺机暂离西公旗，以避其锋，旗印由协理沙格德尔护理。为了交接旗印，奇夫人和沙格德尔都

在佛前点了佛灯以示郑重。据说奇夫人所点的佛灯过早熄灭，迷信者认为，这预示着不祥。

恰在此时，额尔和道尔吉的妹夫酒鬼桑杰，跑来向蒙古驻军白团长报告说：“傅作义部队与奇夫人之间有勾结，请早作准备”。白团长闻讯后，一方面命令部队准备迎战，另一方面派人请奇夫人来团议事。白团长的邀请更加速了奇夫人的逃亡。她当即向来人说：“俟安顿好家务事后就去”。在来人去后，她当晚率领十余人，保护着小阿哥，顺敦达高勒沟经吉日格勒图庙，一直奔向后山，然后朝西拐，连夜逃往五原去了。

太阳快要落山了，白团长还不见奇夫人的到来，他预感到可能上当受骗，当即连夜率领人马围攻奇夫人府，及至进内一看，府内人去楼空，奇夫人早已逃之夭夭了。对此，白团长悔恨莫及，但也无可奈何。由于他没有派人追赶，使奇夫人一行安然逃脱。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包头及其附近地区以后，暂未向后套一带进犯，集中力量巩固已被占领的地区，并休整军队。到一九三八年以

后，他们便向各旗派出了日本人作顾问。日本顾问是各旗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举凡全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全部权力，都掌握在日本顾问手里。

额尔和道尔吉在日寇攻占包头后，即被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指派组织乌拉特西公旗傀儡政府，以取代由色林保、沙格德尔协理护理的旧政府。傀儡政府先成立于包头园子巷，以后才回到旗里。一九三九年，乌兰察布盟派来一名日本退伍军人小仓茂（蒙人叫他乌库拉，可能是日语发音）来旗当顾问。

旗政府成立后，额尔和道尔吉即派桑杰去达日盖庙取旗印。旗印原由奇夫人派出一排兵力把守，非常难取，但桑杰一到，护印军官立即把旗印交出来了。原因是护印军官与桑杰是阿勒坦钦苏木同乡。

### 十三

一九三八年奇夫人逃到套内地区后，很受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视和欢迎，并给予她各种优待和照顾。当时五原军政负责人是

门炳岳（骑七师师长兼绥西警备司令），他命令绥西游击一支队司令武俊峰派人与奇夫人联系并护送到五原。后来，门师长报请委任奇夫人为西公旗游击司令。奇夫人到五原后，先住在永生号皮毛店，后又在梅林庙一带居住。奇夫人虽然流亡在外，但仍关心旗里事务。在五原时，她曾任命一些西公旗军政官员，如：阿拉坦朝鲁、明珠尔、沙格德尔、扎木苏荣扎布、额尔和木巴雅尔等人，用以对抗傀儡政府。

一九四〇年，奇俊峰夫人亲去重庆，谒见了蒋介石，当面汇报了乌拉特西公旗的情况，受到了蒋介石的嘉许，还答应拨给她军装和军饷，命令她迅速打回家乡去。奇夫人从重庆回来后，立即着手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为打回老家去积极进行准备。

在日本势力扶植下，以额尔和道尔吉为首的乌拉特西公旗政府，也任命了满海、太保、色仁朋斯克、敖其尔巴图、松布尔巴图、桑杰等为政府的重要官员。由于扎萨克缺位，他们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职权，于是决定从全旗台吉

贵族中物色扎萨克人选。选来选去，终于选定了家住在古拉本大坝的台吉洛布僧桑杰的儿子阿木尔萨那充当扎萨克。就职那天，全旗大搞欢庆仪式，并请他住在已故大喇嘛达格丹的故居，还为他娶了一房夫人。日本军方也委任新扎萨克为全旗统兵团长。尽管表面上搞的热火朝天，实际阿木尔萨那有职无权，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额尔和道尔吉为人阴险狡猾，是制造西公旗内乱的罪魁祸首。在他代理扎萨克期间，他把对自己好的，有恩情的人，都授以高职，委以重任，并秉承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命令，对奇夫人时期的重要官员都予以流放，以清理障碍。原协理色林保、沙格德尔、梅林章京斯日古楞、官其格巴自尔（系沙格德尔的长子）统统都被流放出去。流放地为锡林郭勒盟，流放期三年。在流放中，沙格德尔、官其格巴自尔父子两人很快地死去。色林保和斯日古楞好歹熬到释放回来，也忧病而死。除此之外，额尔和道尔吉送他四子金自强到伪满王爷庙（乌兰浩特）军官学校上学，后回旗当团长；还在旗里

大搞征兵，为日伪“大东亚圣战”输送炮灰。

#### 十四

陶格套胡巴图（简称陶格套胡），汉名郝游龙，是色林保的唯一儿子。色林保死后，陶格套胡先在日本顾问山本处当特务。因为他做尽了坏事，无法存身，只好跑到伊盟达拉特旗他岳父家去。到达旗以后，他仍然在干坏事，闹的呆不住。再加上他曾指使别人炸过额尔和道尔吉，以泄其父流放致死之恨。尽管事未成功，但也惹起了人家的怀疑。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他决定逃往后套，去投奔奇司令。

陶格套胡为人桀骜不逊飞扬跋扈。在去后套途中，到处收罗土匪、强盗，作为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治资本。及至抵达奇司令处时，他已有部下几十人了。他见到奇司令，首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表示决心愿在奇司令领导下，打回老家去，重建乌拉特西公旗。

奇司令对陶格套胡的为人，也有些耳闻，见面后，首先给她的印象是此人不可靠。因此从心里感到不放心。由于这个原因，在陶格套胡

来投后，当时并没有重用他。

奇司令的态度，并没有影响陶格套胡的情绪。他依然大开招兵买马之门，不久就招收了三个连的兵力。其中：蒙汉都有，鱼龙混杂。他在掌握这部分兵力之后，迫使奇司令不得不委任他为团长，成为奇司令部下的一支劲旅。

## 十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奇司令带领部队随同傅作义的部队返回包头，这时，额尔和道尔吉早已逃到包头。当他听到奇司令回来的消息后，曾跑到距包头半日之遥的地方，热烈欢迎奇司令。奇司令以胜利者的姿态返旗后，对原在旗政府工作的所有人员，一律予以解职，不仅把后来充当扎萨克的阿木尔萨那驱赶回家为民，就连额尔和道尔吉协理也被赶回家中放牛去了。

旗务安排大体就绪后，奇司令去了归绥，办理其子就任旗扎萨克的批准任命手续。经绥远省政府批准后，奇司令立即返旗召集军政官员宣布了这项任命。并选择吉日为年仅八岁的

小阿哥袭爵接位作一切准备。是日举行盛大仪式，除给这位新扎萨克捧上顶戴，授与旗印，使之登上扎萨克的宝座外，又举行盛大宴会，载歌载舞地欢庆了许多天。就奇司令本身来讲，也正以完成了一桩大事而自豪！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安慰。这样，平平静静地过了两年。

陶格套胡名为奇司令手下的团长，但是他野心很大，并不甘心受制于奇司令，他经常不断的招收杂牌军，网罗土匪，以扩大自己的实力。当时在乌拉山南北，陶格套胡也成了一名赫赫有名的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往往走向它的反面，这道理在陶格套胡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在陶格套胡随同奇司令返回西公旗后，不久，竟然在额尔和道尔吉的表态下，抢杀了奇司令母子。

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大致为：（1）陶格套胡因奇司令身边卫兵的武器装备比他的部队好，因而，惹起忌恨，遂生杀机；（2）郝游龙之母有恩于奇俊峰。在奇返旗后，郝母曾两次请求奇给其子加官晋级，均未达到目



的，以致激怒了郝游龙；（3）阿木尔萨那的妻兄贺守忠，（国民党中公旗书记长）不甘心于妹夫的下台，在奇死的前一个月，曾在包头召集郝游龙、金自强（额协理四子）、鄂枢中（西公旗协理）等人开过两次秘密会议，决定刺杀奇俊峰；（4）额尔和道尔吉不甘心失败，经常为消灭奇司令出谋划策。等等。原因虽多，但究其实仍不外是一个“权”字。陶格套胡原非久居人下的池中物，从他一登场就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独特作风来。如他不断地充实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受奇司令的制约，反而逼奇司令为他服务，等等。所有这些都给以后的权利斗争打下牢固的基础。及至羽毛丰满，展翅高飞之时，奇司令母子自然成了他的捕获物和牺牲品了。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七年秋天，奇司令鉴于全国局势动荡不安，住在旗里不太安全，为保险起见，她决定全家迁往包头久居。此其一；她在后套曾结识情夫李隽清（国民党特务。任杭锦旗笔贴式——约等于文书或秘书），还生过一女。

返旗后，不便来往，令人难耐，如居住包头就方便多了。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她约好情夫包头相会，就选择了个吉日，在佛前烧香磕头后，领上阿哥，带上从人，乘坐轿车由公庙子府中出发，直奔包头而去。

太阳落山时，奇司令一行到了乌兰计村。这个村子是陶格套胡部队的驻防地。陶格套胡也住在这里。奇司令认为这个村子是很保险的住处，于是决定在乌兰计过夜，明日再去包头。

陶格套胡对奇司令的来临，表示最热烈地欢迎，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尽力招待，甚至连她们的骑乘也送到牧场妥为放牧。奇司令因旅途困顿，精神疲倦，躺在烟榻上，时而吸食鸦片，以过烟瘾，时而朦胧睡去，以消疲劳。在不知不觉之中，天色黎明。

当日出之际，从人们纷纷备马套车，准备登程。正在忙乱的时候，突然院内伏兵四起，乌黑的枪口直对奇司令及其护兵，逼她们投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奇司令一行只好举起双手，缴械投降了。

在奇司令母子投降之后，立即被陶格套胡带往达日盖庙，把奇司令和她的儿子一同安排住在巴图巴雅尔喇嘛的小院里。并加派岗哨，严禁任何人出入。

在去达日盖庙的途中，陶格套胡派人去叫额尔和道尔吉和太保来庙商量大事。原来陶格套胡回旗以后，经常出入于额尔和道尔吉家中，与额尔和道尔吉三子巴雅尔图之女道络斤有染，早已准备作额尔和道尔吉家的孙女婿，因此忘却杀父之仇，彼此已亲如一家了。

太保名为旗府梅林章京，实则是额尔和道尔吉的忠实助手。他们两个人在抵达达日盖庙后，看到陶格套胡的举动，来势不善，怀有野心，心中甚喜。太保当即劝额尔和道尔吉表态支持陶格套胡消灭奇司令母子的行动，并拥护陶格套胡执掌全旗军政大权，为坚定陶格套胡杀害奇司令母子的决心，太保曾自编自唱几句歌，当场唱给陶格套胡听。歌内充满了阿谀奉承之词，歌曰：

畜群出众的枣骝马哟，是全国有名的陶格套胡。

指挥着全军上战场哟，生来就有公爷的福分。

陶格套胡对如何处置奇司令及扎萨克阿拉腾敖其尔母子，早已心中有数，只是等待额尔和道尔吉的表态而已。及至额尔和道尔吉表明态度后，陶格套胡马上命令心腹随从田三小，密藏在巴图巴雅尔喇嘛家的院墙根一带，伺机刺杀奇司令母子，不久，奇司令带上小阿哥由房内走出来，在刚要走出大门的时候，田三小立即开枪打死了奇司令。十岁的小阿哥情知不妙，马上跑回房内。田三小追进房中，在佛龕中拉出这位小扎萨克来一枪了事。这样，母子同归于尽。奇俊峰死时，年仅三十岁。最后，陶格套胡命人将尸体掩埋在达日盖庙南面的石堆里，后又被人移葬在公庙子以南三印河头上。

在收拾了奇司令母子以后，陶格套胡立即出兵围攻了本很布浪(官牛旗)。那里驻有属于奇司令的少数兵马，他们在遭到突然袭击后，不战而降。陶格套胡又利用降兵作响导，直奔扎萨克府而来，由于天色昏暗，加之降兵又是自

家人，守军不防，致被陶格套胡的军队拥进府中，缴了几十个士兵的械。然后，正式向众宣布，“奇司令母子已被处决！全军司令官由陶格套胡担任”。

关于杀害奇司令母子事件，是陶格套胡的单独行动。他是在贺守忠他们尚未派出刺客以前下的手，走在了贺守忠他们的前边。

## 十六

一九四七年，年仅二十八、九岁的陶格套胡在夺取全旗军政大权以后，志得意满，专横恣纵，目中无人，不可一世。首先，在私生活方面娶了额尔和道尔吉的孙女为妾——不是巴雅尔图之女道络斤，而是曼头之女满达力格力。婚后，与满达力格力经常住在原奇司令府的军部里，置老母、结发妻于不顾。其次，他横征暴敛，按户抽税，以饱私囊。第三，购买汽车一辆，供他个人乘用。在公务方面，他听从额尔和道尔吉的建议，把原已被奇司令赶回老家去的阿木尔萨那，又重新请回到旗当扎萨克，充当傀儡。

这时，额尔和道尔吉由于和陶格套胡结成了亲戚，依然官居原职，声势显赫。为了收敛钱财、积聚财富起见，他别出心裁地仿效卖官鬻爵的办法，在牧民中间大赏职衔和顶戴，以捞取油水。大致上：凡赏给侍卫、门子职衔者，至少须献银子一盆；如赏给地位较高的总管、梅林章京、甲喇职衔者，则必须献出大牲畜若干才行。

## 十七

贺希格太平（又名贺太保）连长，原为奇司令部下，现归陶格套胡指挥，驻防在海流图、乌兰额尔根等地。在他的驻地内经常有傅作义部的散兵游勇经过，他趁机收缴了许多武器。此事被傅作义军方知道后，立即命令陶格套胡如数归还枪支，对此，陶格套胡不敢不遵。

一九四八年秋天，陶格套胡带兵到了苗园圪旦，以全军集合点名为由，通知贺希格太平集中兵力来苗园圪旦点名，及至贺希格太平带兵来到后，正在与陶格套胡寒暄问好之际，分

布在两旁的陶格套胡卫兵早已动手摘下贺希格太平及其随从的枪支。陶格套胡当场宣布撤销贺希格太平连长职务，并勒令回家为民；对其亲信人员，也作了同样处理。至于贺希格太平的原有部队则派其心腹那木吉勒指挥，并调防驻在哈叶胡同。

贺希格太平虽被削职为民，失去军权，但他并不甘心于失败，他经常派人到哈叶胡同与原部队联系，并窥伺陶格套胡的动向。当他发现他的心腹旧部下道老金、道尔吉斯楞、陶格屯格日勒等与新任连长那木吉勒同住一室，而新连长并没有什么戒备之时，于是放心大胆地和他们策划消灭陶格套胡的对策，并等待时机的到来。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有一天陶格套胡乘坐汽车由公庙子总部回乌兰计家的途中，顺路下车到哈叶胡同那木吉勒处巡视。陶格套胡本是个大烟鬼，烟瘾很重，在途中早就烟瘾发作，渴望早些吞云吐雾。及至进屋后，连话也没来的及多说，就吸起料面来了。在他还没过足烟瘾的功夫，突然从窗户和门口伸进了

乌亮的枪口来，向屋里乱放一通。此时，陶格套胡看到身边的侍卫人员和连长那木吉勒都已中弹跌倒，自己想到反抗无益，反招速亡。急中生智，他马上闭住气躺在尸体中，装死哄人。

过了一会，外边人听到屋里没有动静，就扒窗口向屋里马马虎虎地看了一下，只见炕上、地上横七竖八躺的都是尸体，血流遍地，不见一个活人，就认为屋里的人都被打死了，也就没有进屋详细查看。

打死陶格套胡是一件大喜事。因此，贺希格太平的一些旧部下，都打马加鞭急于去后山向贺希格太平报喜，并请功受赏，当他们走到梅力更庙附近的时候，看见一辆汽车从哈叶胡同出来，向东飞驰而去，他们并未在意。谁知这开汽车的正是陶格套胡。原来他在人声寂静后，从尸体中爬了出来，自己开车，加足马力高速度地奔驰回家。

贺希格太平在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后，举行大宴，热烈庆祝，着实地热闹了一番。事后听到陶格套胡并没有死，正在整顿兵马进行报



复，顿时感到手足无措，无奈，只好远走高飞，于是奔往乌兰察布盟去逃难，后来在乌盟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

## 十八

一九四八年年初，陶格套胡竟丧心病狂地与傅作义部下刘万春军长挂上了勾，愿为其反共、剿共的政策效劳卖命。陶格套胡的举动，博得刘万春的赞许，立即委任他为“华北地区剿匪司令”，并命令他组织力量向解放军进攻。

是年末，陶格套胡率部东进。在行至包头东磴口一带时，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遭遇上了。战斗开始后不久，解放军骑兵挥刀冲杀过来，来势勇猛，锐不可当。陶格套胡所部本为土匪集团，又系乌合之众，那里见过这样的大阵势，只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而逃。从此，他再不敢言战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起义。乌拉特西公旗在协理额尔和道尔吉的主持下，也参加了起义，并派松布尔巴图、恩克

巴雅尔等去乌兰察布盟联系，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久，党就派来以赵戈锐（土默特旗人）为首的工作组来旗工作，正式成立了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开展了革命工作。

陶格套胡在参加革命工作后，仍然指挥着全旗武装。但由于他反动立场未变，处处抱有敌对情绪。如解放军骑兵蒙四师以昆都伦为基地，在乌盟境内消灭土匪，要求他予以配合，他却消极应付，不肯出力。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虽然工作人员给他再三地讲政策，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但他却拒绝交待自己的问题，反之，他私藏枪支弹药，设立电台与国民党匪部联系，企图东山再起推翻革命政权。在一次党组织的民族上层人士进京参观团进京参观时，陶格套胡也参加了。当时规定任何人随身不准携带枪支武器，因除参观外，还要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行至张家口时，有人看到陶格套胡睡觉不脱衣服，后来在他洗澡当中，发现他随身带有枪支。对于他一直坚持反动立场，与党和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行为，经我们查证落实了他的罪恶事实后，当即予以逮捕。

一九五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旭日东升，万里无云。旗人民政府召集全旗牧民、农民、干部、战士、学生开大会，庆祝佳节。会场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当会场主持人宣布开会后，立即由解放军带上五、六个人，站在会场当中。原来这些人是斯仁朋斯克、沙格德尔等人，他们在思想改造中，认罪态度好，当场被释放回家。

随即由人民解放军把陶格套胡押上来。这时，解放军蒙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登台讲话，揭发了陶格套胡的大量罪恶事实。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罪大恶极的陶格套胡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当即由人民解放军战士将陶格套胡架至旗人民政府东侧水沟内执行了枪决。

从此，结束了二十多年来乌拉特西公旗的混乱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走向了团结、友爱、光明、繁荣和幸福的道路。

（乌拉特前旗政协供稿）

## 河套解放前后的见闻

董炎炳

河套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傅作义和董其武的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傅、董东进，势力不断扩大，河套便成了后方。到四八年冬，国民党在东北、淮海两大战役已告彻底失败，华北正在岌岌可危之时。原绥远首府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被围，包头市曾一度解放，驻包头的邓宝珊（原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22军）和冯钦哉奉命于四八年十月十九日撤离包头，途经河套，西奔宁夏，河套乱成一片。各县军政人员，大都逃离县城。后因归、包一带解放军为了集中兵力，配合华北战役，自行转移后，邓、冯才于十一月三十日返回包头，并逐段修复归绥到绥西河套的交通。就在北平解放前夕，暂时偏安在绥远的傅作义嫡系董其武部恐慌万状，为准备退路和解决军需的供应，抓紧了绥西河套的工作。于一九四八年除夕对河套各县县长作了一次调整，我就是那时候临危受

命，充任原米仓县县长的。记得四九年元月二日早晨，我和各县新任县长一起去受董其武主席的接见时，董说：“绥西河套是咱们的老根据地，现在乱了阵，为此，派你们去和在那里原有的人员赶快整顿一下地方武装，注意维护地方治安，最主要的是催要上年的欠粮，以供给当前军粮的急需。”五日晚在五原过夜时即听到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元旦文告”宣布“引退”的消息，当时新任晏江县副县长段震环就说了一句：“这一下国民党完蛋了”。在场的人都不作声，就这样我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于四九年元月六日到达米仓县上任。

### 一、地方已经民穷财尽，反动政府仍要追交粮食

我到米仓县后除对一般工作略事安排后，重点督促催要前一年的欠粮，但这次催要和以往有所不同，要执行傅、董提出的“合理负担政策”。所谓“合理负担政策”，实质上并不合理，并没有提出什么合理的具体措施，只是笼统的提出“大户多担，中户均摊，小户少担，

农户不担”。河套是个产粮区，号称“塞外江南”。自从一九三九年，傅、董来到这里后，号称有20万的军政人员，主要就靠着河套的粮食供应。评定各县工作的好坏，主要以征粮完成多少为标志，但从来却没有一个县、乡完成过征粮任务。这是由于一方面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有权势、有门路的大户拖欠不交所致。农民负担原来只有农业税(交款)，抗战时期，把农业税交现金改为交粮，叫做“征实”。傅作义的部队云集河套，以所征之粮，供其所需，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即按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增加了征购粮(说是购粮但不给钱，给储蓄票)和征借粮(说是将来要还，实是有借无还)。另外还增加了省公粮和县公粮、水费粮、乡保经费粮、杂差摊派粮、渠道柴工粮等等，真是名目繁多，数额越来越大。农民种地打粮有数，而交纳各项粮无止无尽，农民反正弄不清都是什么项目，只知田粮干事给他统计的总数，所以就把它笼统的叫做“统计”粮。由于负担重，任务急，干部下乡催粮对一般平民强迫命令，不择手段，吊、打、管、押那是家

常便饭。我一九四四年在“绥干团”任职时，曾下河套各县、乡作过辅导工作，见闻到催粮用的奇刑，如站冰房、坐栽角、抹大粪等等，还有一个乡干事叫张玉田，在催粮时，他叫人把石磨上半扇吊起来，说是谁要是不交粮，就要把谁压在磨扇下边，一时激起民愤，在场农民一哄而起，用吊起的磨扇反把他压了一下，后来人们就给张玉田起了个外号叫“张磨扇”。我们在安北县的乡村，见到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白天坐在炕上盖着破被子，等她妈回来换穿上裤子再下地出门。我们在走向米仓县（三道桥）的途中，看到农民多以山药、萝卜和野菜充饥，回到县里反映这种情况时，当局说那是农民对付征粮的假象。据闻，就在米仓县曾有两个雇人种地的寡妇，因交不起粮去找乔学曾县长诉苦，乔县长对她们说：“张寡妇、李寡妇，你们的军粮短不住。”寡妇们又诉说：“再交粮就得卖锅”。乔说：“卖了大锅买小锅，卖了小锅搁伙锅。”一时被人们传为笑谈，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管负担怎样重，农民忍受着何等痛苦，然而为了挽救

国家民族的危亡，对当局并无怨恨之心，把一切都归咎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及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而傅作义却追随蒋介石发动内战，致使河套人民继续背着难以忍受的负担，当时农民为抒发怨气，编成诉苦歌谣：“租上牛、种上地，卖了老婆打“统计”，打的打，吊的吊，临完给张储蓄票，三年五年没人要”。其实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本没有给农民归还购粮储蓄和征借粮款。到了解放前夕，储蓄票和法币都成了废纸，人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再加上一九四八年河套兵荒马乱，青壮男子多被抓兵，缺乏劳力，渠道失修，四九年复兴渠、杨家河均决口成灾，这样的天灾人祸，把农民折腾的实在活不下去了，当时农民有一首自编的访友歌，可以说明农民的贫困情况，歌词是：“二饼子车，格楞楞响，不知王哥哥来探望，早知王哥哥来探望，我给王哥哥蒸糜子窝窝尝。”农民住的是：“一门一窗，人起炕光，地下有个水缸”。穿的是“白天穿，晚上盖，阴天下雨毛朝外——一件破皮袄”。真是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为此，傅、董为了缓和农民的反抗才提



出所谓“合理负担政策”。当然，国民党政府本来就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对大户（即地主阶级，大都是地方实力派或与政府官员及军官有勾结）催要征粮时，却是另一种态度。本来在丈青时，（原来河套种地每年有变化，在青苗出土后，乡保派人去丈量土地作征粮根据叫做丈青）大户依仗权势或请客送礼，就占了便宜，在交粮时又用推、拖、顽抗和开空票等方法搪塞过关，有的特殊大户，一般县乡官吏根本就不敢去催要。就是县科、局级官吏和省督粮员去要，也得客客气气，所谓“睡下不敢叫，叫起来不敢要。”曾有一个叫张亨信的干部，到蛮会乡任乡长。在催粮时，农民普遍对他说：“你只要把某某大户的粮食催交了，我们的公粮不要催，就是不吃也会送的，你不敢去催要他的粮，就是打死我们，也不送交”。张乡长见到老百姓都拿某某奸顽大户做挡箭牌，任务又完成的不好，也不敢和大户硬来，便想出一个出奇的办法，直往那个大户家里走去，低声下气的首先说明全乡农民都以他的交粮为榜样，请他先送交，不料那大户无论怎样说好

话，还是推拖不交。张乡长无奈中便跪在地下，口称“您不交粮，我就不起来。”这一手可把那大户难住了，不得已就答应马上送粮。待那大户有了实际行动时，张乡长便再到全乡各地去催粮，结果那一年完成的征粮成绩比较好。上面得知这件事后，认为张乡长会办事，工作能力强，便把张乡长提升为临河县政府秘书。其后又把张亨信任命为晏江县县长。由此可以认定，傅、董对农民的穷苦和农村大户的特权势力不是不知道的。到了一九四八年，看到华北岌岌可危，但又不能间断军粮民食的供应，一般农民又无多少油水可挤，这就是当时提出所谓“合理负担政策”的另一个来历。但实际上在一九四八年计征时，并未给大户多计，小户少计，贫户不计，说合理依然不合理，而是提出的口号罢了。曾在四八年冬，河套大乱时，农民不但抗粮不交，还在世城西一带发生饥民到仓库抢分粮食的事件。在四九年春青黄不接之时催粮，我怕激起民乱，便凭着“合理负担”的招牌，组织县、科、局级干部包催大户、乡保人员包催中户，并到处讲

“合理负担政策”，在当时的形势下，大户已无所凭恃，也不敢十分顽抗，仅有少数跑到陕北找专员陈国祯说情，我也不理睬，只是照着董其武的布置来办事，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 二、解放前夕，又一次抓兵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接到原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下令要在河套成立保安师，还要来一次征兵，分配到米仓县的兵额是300多人。为了减少阻力，避免适龄壮丁恐慌乱跑，命令规定要向群众宣传成立保安师是地方武装，就在河套驻防，保证不往外调。要按规定的条件征集，各县都以军事、民政、警察局和接收兵员的部队单位组成临时征兵委员会，进行征集工作。在米仓县，当时认为所要的壮丁就在米仓县本地驻防，人数也不多，条件也明确，人民不会有恐慌躲藏的现象，不料把任务布置下去之后，有的乡干部仍以先下手为强进行抓兵，适龄壮丁在当时就有反抗逃跑的，抓兵的警察竟开枪打伤一名壮丁的腿部，而且送县的壮丁有的捆绑起来如上杀场，妻子儿女的哭嚎声，爹娘

的哀求状，不忍闻睹。虽然硬着头皮，总算把征集的兵额完成了，但人民却怨声载道。这里顺便追溯一下傅、董在河套征兵的始末。傅作义一九三九年初，率部从山西第二战区回到绥西后套，对军政进行了一些整顿后，就投入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战役，虽取得胜利，然而兵员损失较重。傅便凭着胜利的功劳，一个劲的向上要人、要物，通过国民党中央从陕西和甘肃大量补充兵员，而没有在河套征兵，这是傅认为河套需要劳力生产粮食，所有适龄壮丁，乃是囊中之物，迟早必为己用。所以当时就在河套成立四个国民兵训练营（我被临时调到第四营任政治指导员），将河套适龄壮丁，分三期三批轮训一遍，为以后征兵打下基础。自那以后每年在河套征集一部分兵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命傅作义接收热、察、绥三省，傅为了抢占地盘，扩大势力范围，一次把河套适龄壮丁，除了大户子弟，少数逃跑者外，全部征集扩军东进。其中有的虽已超龄留上胡须，也被剃掉抓去。抗日战争好不容易胜利了，而河套人民却照样遭受苦难，闹得妻

离子散，骨肉分离。当局为了欺骗群众，给每丁家属二石糜子一丈二尺土布算是对他们的安置。群众愤恨不满的骂角：“二石糜子丈二布，老婆交给保队付、保队付养不住，乡长干事随便住。”“勘乱”三年，傅、董知道河套已无兵丁可征，说是河套在抗战时期贡献大，为了照顾，不再在河套征兵。但到解放的曙光在望时，河套刚有些长大的娃娃，于是又要成立保安师，又来一次抓兵，人民思前想后，怎能不愤慨反抗呢？当时所成立的保安师，实际并不保安，反而扰害人民。如驻米仓县的保安师的一个保安团，团长叫胡文炬，是从张家口战败后逃跑回来的一个校级官。来米仓时间并不长，群众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胡日鬼”。因为在四九年的五、六月间，距米仓县城以西，只有二、三里路的梅令庙省立农业中学学生们在演戏，有保安团的一个营长太太去看戏，因为师生和观众并不认识她，没有给她让座，太太生了气，回去叫来一连军队，持枪向演戏学生冲杀，当场有两名学生受重伤，刺刀从臂部刺入二寸来深，学校当局将受重伤的学

生用担架抬着，全体师生列队跟着，到我所在的县政府来打官司。“县官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我哪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呢？但既到县政府，也不能推脱不管。于是我把胡团长请来和学校当局协商谈判，校方一位教师就当着我的面，勇敢而气愤地质问道：“你们到底是保安团？还是害民团？”那个胡团长只是空口说：“查办、惩处。”而不解决实际问题。在外边等候的师生，早知道那个团长是个滑头鬼，在县里解决不了问题，便抬着伤生，冲向陕坝去了。事后保安师政工处郭光发处长对我说：“农中师生到陕坝准备联合陕坝师范和中学师生举行抗议游行，在街上贴标语，我们接到胡团长的电话报告后，采取措施制止了。”而对肇事者却未作惩处，以不了而了之。后来我见到临河县樊库县长，将此事经过告诉他，樊县长说：“我县比你县还厉害，驻军还在人头上跑马哩！”我一时不明白，怎么还能在人头上跑马，樊县长解释说：“骑上马，把人撞倒，马蹄子踩在人的头上，那还不是在人头上跑马！”河套人民真是多灾多难，在国民党时

期，除了受当地统治者剥削欺压外，还要受外来客军的抢掠掠夺。四八年冬天，包头一度解放时，邓宝珊和冯钦哉部逃到河套，沿途抢劫过一次。到了一九四九年瓜熟时，原系辽、沈战役后逃奔来的东北蒙骑一旅，苏和巴图的部队，计划要去投奔西蒙政府，先驻在沿阴山同义隆一带休兵补充，后开到米仓县北部。沿途抢劫民财，人吃马喂，强奸妇女，无所不为。最后正当他们满载而去时，驻在米仓县保安团的“胡日鬼”说他奉命截击该部，对我说：只要吓唬一下，他们就跑了，咱们就能抢些“洋捞”，遂即把他的保安团布置出去，三面包围对方，岂不知那部队多是“拉杆”出身，光靠包围吓唬不住。“胡日鬼”眼看着人家不慌不忙的拉上马，驮上东西有条不紊的出发了，抢“洋捞”的希望就要落空，便乘机命令士兵追赶，结果让人家回头打死在本地征的二名新兵，为给他们抢“洋捞”而伤害了性命。

### 三 起义与反起义在河套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初，在河套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中并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提到的“绥远方式”。北平解放后绥远酝酿和平时，在河套主要军政人员中，对和平起义都抱有不同的态度，当时在陕坝有个行政专员陈国祯（特务）、警备司令于霖瑞，此二人均为大势所迫不便表态，只有等待观望。各县县长，在重新调配时，就是照顾着派系平衡的。五原县长刘惠之，临河县长樊库和米仓县长董炎炳，算是傅、董系统的人。安北县长冯铭汤是绥远地方势力派选拔的接班人，曾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回来的，晏江县长王凤鸣乃是潘秀仁的亲信，狼山县县长乔象亨是杜品三（省统计长）的人，这些属于不同派系的人，基本上都是以他们派系主子的政治态度为转移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反对和平起义的顽固派潘秀仁和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省府财政厅长张遐民带了二十余人跑到河套陕坝来，据说奉董其武主席之命要在陕坝成立绥远省府绥西行署，由他二人分任正、副主任，重新经营河套，继续与共产党为敌。并且向我们欺骗的说：“你们



在这里不知道，农历年时，归绥曾一度吃紧，在宝塔以东的陶卜齐打了一仗，我们曾跑到火车上，到后来情况好转，我们又从火车上回去和董主席研究好，让我们来的，现在归绥有些人要和共产党媾和谈，其实那还不是投降吗？是人生莫大耻辱，傅先生在北平，那是不得已的事，我们还有退路，只要坚持，必然有变，我们重新整顿河套老根据地，就是为支持前方和准备退路”云云。事后才知道他们在归绥呆不下去了，硬向董其武讨了个名义，借口跑到河套，观察一时，如形势对他们有利，便会卷土重来，否则便又逃跑罢了。那时前边有孙兰峰在包头驻扎，后方尚有宁夏“马家”势力，所以河套显得暂时偏安，酝酿和平起义，不敢公开宣传，在狼山县升旗杆上，不知是谁给贴着一一条标语：写着“谁要宣传和平小心手榴弹”。潘、张就利用这一暂时苟安时期，在陕坝旧银行院内组成绥西行署，下设民、财、建、教四科和总务室，共二十多人，都是潘、张带来的人员。行署组成后，于三月下旬在陕坝召开了绥西行政会议，在会议期间的早会

上，新成立的保安师师长张付元到会讲了话，表示对潘、张的支持。原绥西专署因行署的成立，便不存在，专员陈国祯也没再安排什么职务，他就呆在家里睡大觉，也不参加行政会议，参加的人员主要是各县正副县长和地方绅士及行署人员共四十余人。潘秀仁主任亲自主持会议，张遐民副主任作形势报告，大意是华北败局，是傅先生部署失误，现在还有江南和西北，美国绝不能眼看着让共产党占据全中国，过去的失败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只要自强，扭转局势还有希望，如和共产党和谈，那实际就是投降，是人生莫大的耻辱，我们应当把河套整理好，支援前方，坚持待变。接着分组讨论大会发言，其目的是要统一认识，贯彻整理河套的各项措施，达到反对和平起义的目的。岂不知参加会议的人，各有不同的看法和目的，河套地方上一些眼光短浅的绅士，还相信那些鬼话，认为自己有人给撑腰了。在会议之外，又秘密开小会，商讨他们要攻击的对象。晏江县的周二马（县水利局长又是大户），因在一九四八年冬河套大乱时挨了地方部队的

打，在会上要求给自己报仇，不给报仇，就大吵大闹。临河的大户劣绅王开鑫，因为樊库县长派人到他家抓了壮丁，在会外暗中串连，积极鼓动在反对和平起义时要以樊县长为攻击重点，似乎樊库县长有所察觉，便在大会上发言时首先发难，公开提出：“现在吃得开的人应当是戴草帽的，而不应当再是戴礼帽的了，如果我们的工作，再让戴礼帽的人处处作祟，那我们什么都办不成，……”这一下惹恼了那些绅士们，抢着发言，目标集中对樊县长进行人身攻击，潘秀仁站在讲台上，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干气说不出话来，这就在会上引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五原县长刘惠之，因当县长的时间比较长，对付绅士们的经验比较多，在大会上发言时把戴草帽和戴礼帽的区分改变成“好人抬头、坏人低头、罪人回头、恶人掉头”来调和会上的争执。潘秀仁在无可奈何中便说了一句“刘县长讲的还有些道理”，才找到下台阶。行政会议后不久，他们便运用手中还有的权利，气极败坏地把临河县长樊库撤职了，调换刘惠之到临河任县长，董其武又

从省里派王震亚充任五原县长，潘、张只是达到了打击报复的目的，并未增强自己的实力。但这个时期在河套却形成了以潘、张为代表反对和平起义的中心。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山西的阎锡山也逃到了广州，解放军直趋陕、甘、宁，潘秀仁看形势不妙，便借口急忙向董其武索要了一封到广州去求要经费和军火的介绍信逃跑了。潘在逃跑前晏江县长王凤鸣得到讯息，看出破绽，便去找潘提出质问：“你有办法走了，丢下我们该怎么活呀？”两人争执得面红耳赤。潘走后留下张退民，继续在河套支持政局。张在表面上装腔作势，而内心里却坐卧不安，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小车，说是要到各县检查工作，在五月间的一天到了米仓县，召集政府人员讲话，这次讲话的语气和上次在行政会议上的“形势报告”显有不同。并且表示抱歉的说：“来河套之后尚未到县里看过大家，这次虽然自己心脏病复发，仍坚持前来”，不用饭，不住宿，便要返回陕坝。临走前还胡说什么：“共产党卖

国，如果不卖国，我们还不如投降共产党好。”当时我不解其意，后听到张遐民已到宁夏住院养病去了，但在起义前夕，张又跟随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包头破坏和平起义。潘、张二人在河套期间，原绥远省政府统计长杜品三（特务、顽固派）也曾逃到陕坝，观察了一段时间，又向西逃跑，杜在陕坝装得很善良，在《奋斗日报》上发表百病验方，以笼络民心。后来还有原省政府教育厅长苏挺，说是来河套视察学校的，也不知“视察”到什么地方去了。潘、张逃走后，董其武指派省政府原民政厅长王则鼎来河套接任“绥西行署”主任，而王是傅、董的人，因肛门病到陕坝住院不能视事，后来转院到重庆去治疗，从此河套专署不复存在，“绥西行署”名存实亡。形势大变，舆论哗然，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日趋激烈。

迨至四九年六、七月间，绥远省政府召集各县县长及行政官员到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麻花板革新学院（原绥干团）参加革新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实际就是给和平起义做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革新”是要和平起义的

别名词)，讨论的中心是认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说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共产党实行的就是民生主义。除了讨论要“革新”各项施政措施外，由省革新委员会成员和一些革新派的人在会外秘密做我们的工作，如康保安私自交给我毛主席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解放区来的《绥蒙日报》，我也曾到过他家中，他给我谈了些到北平和谈的情况及应跟上董其武走和平起义道路的道理，在回绥西之前，又由康保安、张立范、寿跃南三人在省府主席办公室西边的小屋内，召集河套地区刘惠之县长和我二人，部署和平起义时组织联系和宣传策略，每人给携带了《为什么要和平》小册子二百份，并且规定以陕坝汽车站为联络地址，如果万一发生混乱，应当采取的措施，以及革新学院将要分配到各县去的毕业学员如何使用等问题。我回米仓县之后，按照革新学院讨论会的精神和省革新委员会的布置进行了工作，在米仓县选派了军事科长兼保警队副队长崔以强等数人去革新学院学习，暗中联络组织领导核心，利用和保安师政

治处长郭光发的同学关系，探试保安师的动态，准备万一发生混乱时有所准备。至八月间，崔以强等学习回来，并带回一批从革新学院毕业的学员，分配任乡干事，人们称他们为革新干事，作为掌握乡政的骨干，利用每星期集中学习的时间汇报各乡的动态。崔还传达说，董其武主席讲：要县里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如果有大户敢反抗者，必须予以镇压，但后来并未见下令执行。当时，河套起义与反起义的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董其武的亲信部队张世珍已经进驻五原，对河套革新力量起了支柱作用，兵随将转，为政在人，五原、临河和米仓行政权利基本掌握在革新派手中。安北、晏江和狼山行政权利实际还掌握在顽固派手中，但不是主要县城，迫于形势又不敢公开进行反抗活动。陕坝是个杂乱地方，保安师虽未公开表态，然而并没有什么战斗力，师长张付元和警备司令于霖瑞，基本上还得听董其武的，虽然这时还没有明确提出要和平起义，而代表起义的“革新派”已占了优势，因为和平起义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变革，来

的突然，除了顽固派和特务的破坏外，就是基本愿意起义的一般军政人员思想也赶不上形势，顾虑多，阻力大。顽固派说：和平就是“投降”、“背叛”，“是人生莫大的耻辱”。革新派说：“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的，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向人民投降、背叛腐败的国民党，不再当大地主的看门狗，替大资本家保镖，正是由黑暗走向光明，是人生莫大的光荣”。两种论调，在河套一切集团和个人间或明或暗的争论着，直到九月初，突然听到说傅作义先生奉毛主席之命，来到绥远，解决绥远问题，这时军政人员似乎都有了靠山，静候着动态和消息。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董其武先生在包头率领原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四万多人起义了。通电发出之后，毛主席当即电示：“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消息传到河套，首先是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人民得到解放，欢喜若狂。深陷泥淖难以自拔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得救了，一片欢腾。当



然那些顽固不化的余孽和特务，因大势所趋，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不敢作声向隅而泣。有一些心怀鬼胎，表面装着拥护起义，内心却隐藏着“借水养鱼”混入起义队伍，等待时机，企图卷土重来。还有国民党政府派来包头的军令部长徐永昌破坏起义未成，临走时说：“三年后再见”，给他们留下一点妄想。

在米仓县，接到起义通电后，我和省田粮处派来的田粮督导员李适之联名代表全县起义军政人员向董其武先生发了拥护起义的电文。并召开了庆祝起义大会。米仓县人民第一次呼出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 四、和平起义后，还有尖锐复杂的斗争

起义后，省里通知在各县组成新政策推进委员会，领导宣传推行新政策。在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派来干部，起义人员也未学习过，新的政策是什么？怎样去推进？根本不清楚，只有在工作上维持现状，对干部照着上面传达下来的话进行宣传：“起义就是由反动派阵营倒向

革命阵营的革命行动，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革命一家，照常使用，以后要好好跟上共产党作革命工作等等”。口里这样讲，思想上却对党的起义人员政策半信半疑，期望着共产党快点派人来。但特务和反动余孽是怕共产党派人来，借机造谣挑拨。当时有陕坝师范校长张鹏举到了米仓，有人问张：“你看共产党将来会不会照常任用我们？”张答：“人家拚死拚活打下江山为的什么？”在四九年终省里将要新旧政府合并时，召集河套地区各县长到省里开会，听取高克林政委的讲话，把我们安置在归绥公教医院内住宿，吃的是“中灶”饭，有人对我说：“这是优待俘虏”。一九五〇年三月间我刚参加工作团到临河遇见一个旧友叫郭世杰，他问我和共产党一起工作怎么样，我说：“工作不错，讲究民主，连讲话稿都经过讨论的”。郭说：“那就是铁幕”。他们竭尽挑拨之能事。真心拥护起义的人，是希望早些有共产党干部来领导工作，以便有所适从。在五原县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个男性壮年叫

杨致平，原在杭州，流窜到河套找他舅舅，暂时住在五原城内客店里，他看到这里虽然起义了，一切还是照旧，人民和起义干部都希望共产党、毛主席赶快派人来，便想借机进行拐骗，就有意对人说：“我是共产党秘密派来的五原县政委，先来到这里等一下，上级任命通知发来后，再去上任到职”。这个话传到五原县长王震亚的耳朵里，王未加分析考虑，便把这个未任命的“杨政委”先迎接到县政府内居住，从优招待，并给零花钱，在新政策和工作问题上，也去请示“杨政委”。假得真不得，那“杨政委”对新政策一窍不通，行动上恍恍惚惚，也不象个共产党人的样子，没过多天，便露了馅，王县长便让姓杨的走了，以后传为笑柄，但却说明了想望共产党派人来的殷切期望。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底派来了生产建政工作团，军队里派来了政委和政治工作人员，开始进行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的工作。而潜伏在河套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派并不甘心死亡，和我们唱开对台戏，开始敌人先是造谣、挑拨，制造反动舆论，

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起来了。”“国民党有美国的帮助，将来还会回来的”。“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是先甜后苦，将来迟早是要清除的”。我们为了解决军民的食油问题，提倡农民多种些胡麻，敌人就借机造谣说：“共产党提倡的胡麻是大头胡麻(鸦片)”，挑动有些不明真情和有嗜好的人，就种起鸦片来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便发动所有干部和学生，查处了一次鸦片苗。在我们废保建政期间，敌人便由省到县安排了他们的地下首要人物，上有绥远省国民党地下主席，下有河套地下专员冯铭汤(原为安北县长，混入起义队伍后暗中是国民党地下河套专员)。各县也大都有了地下县长，旁的县不清楚，晏江县地下县长叫张文玉，是个地主，在剿匪肃特时，被我们抓获镇压。敌人最为毒辣的手段，是挑动军队哗变和士兵逃跑为匪，有的就是混在军内的特务和反共顽固派余孽，起来进行捣乱，扰乱地方治安，破坏新政工作，杀害我新派来的党、政、军干部。就在五〇年夏秋时期，把个和平解放后的河套，弄得到处不得安宁。五〇年夏，人

民政府建立后，安北新任副县长王锦云同志（系共产党员），到余太去工作，跟随原保警队十人，行至中途哗变为匪，将王锦云同志和通讯员及秘书三人杀害。原驻五原的第七师改编成三十七军，改编后由副师长庞茂卿率领一个团哗变，窜至晏江县北同义隆一带，企图据山反共，被其蒙蔽的下属知其阴谋后，极为不满，起来反对，有个排长叫孙得胜，将庞击毙，将军队反正归队。一九五〇年的五月间，原西公旗郝游龙部卢万惠团四百多人哗变，盘据在晏江同义隆以北千里庙一带山中，不时出来抢扰人民，后经我们做工作收编。至秋天，在沿山乌加河一带，股匪四起，我工作人员只得换成便衣才能行动，有绥远省人民政府派来的一位同志被匪抓去，暴露了我县区情况，一股劲匪即袭击了我第三区公所（乌加河南李二毛旦圪旦）在区委书记兼区长高文厚和通讯员樊中厚机智果断的坚决反击下而未遭伤亡，但区公所被抢劫一空，原扣有四个零匪，又被抢去归山了。还曾有过一股较大的土匪，窜至同义隆升起国民党旗，妄想死灰复燃。有一天晚

间，二百多人来袭击我晏江县人民政府（即现五原塔尔湖）。匪徒越过塔尔湖以北沙梁时，幸被住在邬家地的安思达骑兵旅，为了解决部队食油问题派在张威圪旦来榨油的几个战士，为了自卫，晚上轮流站岗，发现土匪时，即开枪警告，土匪原来打算偷袭，现在见到距离县城约有两华里的张威圪旦有岗哨，即下令收匪归山。其实我们毫无所悉，要不是榨油战士放那一枪，晏江县人民政府将要受到损害。在狼山县以北山上，有郭长青匪首，约有三百人，据山为王，郭所骑的座马，当时在河套是最快的马，能追上汽车，不时抢劫扰民，继续顽固地反共反人民。驻在狼山县境的张朴师，原系晋北应县一带地主武装组成，曾在应县顽固守城出了名，现在虽然参加起义了，然而内心不服。在五〇年五、六月间，突然一天晚间，从狼山县跑回五原的一个人路过晏江转告我们说：“狼山的张朴师，可能要哗变，共产党派到该师的政工人员，已经撤回陕坝。另一种谣传，说是派到张朴师的政工人员，有的被杀害活埋了。事后证明，有哗变的动向，政工人员

撤回陕坝是实，杀害政工人员并无其事，只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及时地进行工作，才挽回了张朴师的动摇不定的局面。在米仓县也是土匪四起，较大的股匪有张疤子、王如意等两个头目，在五〇年夏秋间，袭击了我原平章乡新建的四区公所，打死我田区长(共产党员)和起义干部吴建民、宁良定等四人。在临河当过县长的地方绅士崔正春，到处进行反共活动，不只是在临河活动，并且还跑到各县进行反革命串连活动。我到晏江工作时，就知道崔到晏江和地主王伟(原在县水利局任职)联系过。一九五〇年三月生产建政工作团到临河后，当地驻军张团长，虽然也是起义的，但思想上不服气，看见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都不顺眼。有一天在临河街上的一个商店里，张团长和一位工作团的老干部相遇，让路时碰了一下，张团长生了气，就在当天晚上五时前后，便派他团的队伍，把工作团住所——临河县政府包围，在对门架起两挺轻机枪。工作团的全体同志，事先并不知道，适值有两位同志要出门，突然听到包围士兵喊：“口令？”接着喊“不准出来”，

这才发现已被包围，马上把情况报告临河分团团政委兼分团长李桂芳同志，李马上找原临河县长刘惠之，和参加工作团工作来临河的车采风、柴生华、董炎炳，共同研究解决这一突然紧急事件的办法。因不明部队的动向和意图，电话线已被截断，人又出不去，有话不能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立即研究决定：一面让全团工作人员戒备，防止万一，准备自卫，另一方面让车采风以董其武主席的私人秘书名义连唬带闯地去见张团长，晓以大义，讲明政策，说明总的形势，使其悬崖勒马，解除对工作团的包围。因为车采风给董其武主席当过多年私人秘书，部队团长以上的“官”都认识，车参加工作团又是董派来的，也勇于接受这一任务，就单人出去对包围我们部队的带班人说：“我叫车采风，是董其武主席派在工作团的代表，一定要见你们的团长，请你引见”。那带班人传报给团长后回来说：“团长已睡觉不能见”。车说：“就是睡着了我也要去见他”。带班的又第二次把车采风要见的实情报告张团长，张从被窝里爬起来，接见了



车，经车交谈之后，张团长马上下令撤除对工作团的包围。第二天早晨，便派该团副团长到工作团来赔礼道歉，我们也相应接待座谈，表明以后要相互帮助和配合。

和平解放后初期，河套地区并不是和平安宁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或明或暗或文或武，到处都有敌我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当时地方新的政权尚不健全，军队尚未整顿，不但不能剿匪，反而有的为匪，直到一九五〇年冬，将旧的部队全部调往河北整顿，调来了解放军精锐部队蒙骑四师，密切配合地方人民政权进行大张旗鼓地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运动，河套的革命与建设工作，才逐步纳入正轨。

# 忆原米仓县“九·一九”起义

吕济世

原米仓县成立于一九四二年，到全国解放只有八年的历史，正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期。米仓县与陕坝毗邻（现合并为杭锦后旗）。陕坝当时是绥远省的临时省会，一九三九年傅作义从山西河曲来河套时，带来一批军政人员，其中有邀来的共产党人。所以当时这里很有些抗战气氛，唱的是八路军编的抗战歌曲；演的是激发士气和宣传爱国抗战的话剧；在学校和社会上能看到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艾思奇著作《大众哲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革命书籍；在学生和老百姓中灌输了一些爱国思想；所以当时军队士气和老百姓的爱国情绪，都还比较旺盛。到了抗战后半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逐步暴露，特务横行，到处抓人，人人

自危。傅作义将邀来的共产党人，护送出境。从此以后，河套顿时出现了白色恐怖的局面。抗战胜利后，傅作义率部东进，把河套的军队主力和干部大部东调。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统治区处于混乱状态，原米仓县也不例外。

当时国民党上下贪污成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社会秩序异常混乱，通货膨胀严重，伪法币已成废纸，印出的10万、25万、50万、百万之大钞充斥市场。物价暴涨，早晚市价就有很大变化，50万元大钞只能买一盒火柴。伪法币已经崩溃，毫无信用。人们手里宁可存货，不肯留法币，政府人员的工资用小麦来代替，在临近起义前夕，连小麦也发不开了，便欠在帐上。当时物资缺乏，布匹很少，人们穿衣都成了问题，还得由黄河运小麦到包头换回布匹。败退下来的杂牌军队和土匪没有两样，欺负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失尽人心。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节节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我们这些干部因对共产

党不了解，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认为自己前途暗淡，没有出路。尤其是一九四八年冬解放军打下包头时，河套地区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上下乱作一团。当时米仓县的干部和警察局的人认为大势已去，厄运将要来临，许多人积极作逃命准备，准备逃到山里躲藏，后来解放军为配合平津战役主动撤离包头后，才逐渐安定下来。

当时国民党为失败已成定局，在这垂危阶段，谣言更盛往昔，说什么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凡给国民党干过事的一律杀头，连保甲长也在内，而且不给个好死。谣言搞得人人惊恐不安。但是，过分的夸张，往往使人感到其虚假。我当时想，如果真象他们宣传的那样：

“解放军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为什么还能节节胜利呢？当时胡柜城（现沙海公社）有我认识的一个在别动队当过兵的，在萨县被解放军俘虏后又释放回家。我暗中访问了他，他告诉我：“可不能听他们（指国民党）的宣传，人家可好哩。我被俘后，人家还给我发了一件皮衣，还给我拿路费让我回家，对人很和气”。

于是我放心了一半，认为自己起码不至被杀头，能让我回家务农就好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起义，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在绥远省起义前夕，米仓县境内的行政人员鉴于大势已去，认为起义总比当俘虏好些，最起码不会被杀头，所以大多数人都同意起义。

起义前，国民党绥远省政府发来一个进行土改的文件，因当时参议会都掌握在地主官僚手中，土改是损害他们利益的，所以压下没有公布，连我也没有看到，只是听说了。其实就是公布了也不过流于形式。要付诸实施是根本不可能的。后来绥远省成立了革新学院，主要是轮训干部，准备起义，学期十四天。当时米仓县去了十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结业离校，十九日到达包头，正值九·一九和平起义通电发表，我们回到米仓后，省里又派来一批革新干部。

“九·一九”起义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工作团尚未到来，还是旧米仓的原班人马，政策也

没改，社会秩序更乱。有些杂牌部队，如陈秉义、别动军、包贵廷蒙伪军等不断搔扰，老百姓的日子很苦。十二月间，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军政干部学习团，对起义军政人员进行训练，主要是进行政策教育，初步摸一下干部队伍情况。米仓县又派我们科长、乡长、科员、干事等十三余人，由县长董炎炳带领到呼市报到，学习了将近三个月。结业后，由省人民政府统一编成若干个春耕工作检查团，每县一个分团，由指派的分团长率领分赴各旗县，检查督促农业生产。我们这个分团由团长秦丰川率领来到米仓。这时上面已给县里派来了县长、县委书记和一批党的干部，建立了县人民政府，我们在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工作。

从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到五月结束，前后工作三个多月时间。工作团来到陕坝，开始宣传政策，维持社会秩序，安定人心，积极领导春耕生产，把所有的干部组织下乡搞春耕。同时在乡下搞“废保建政”，废除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区、乡自然村等人民政权。

就在我们的工作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在

山湾一带又出现了张疤子、王如意、张德彦等一伙土匪，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到处烧杀抢掠，袭击地方政权，曾攻入四区区公所（现在大树湾公社所在地），区长田贵生，助理员武建民，区小队员宁良定、霍二官惨遭杀害。真是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在春、夏期间曾猖獗一时。九月间，上级派来蒙四师骑兵进剿，仅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全部消灭罄尽，地方秩序大为改观。以后开展了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压一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安定了民心，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杭锦后旗政协供稿）

## 在“綏西行署”期間的点滴見聞

董玉奇

### (一)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进军关内，直指平津，华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即将爆发，胜负如何，是举国上下极为关切的问题。所以当时原綏远省的军政人员，既关心注视着华北五省“剿总”傅作义先生调兵遣将指挥作战的动态，同时还观察分析着形势发展变化的未来前景。

不久以后，解放军在河北挫败了傅先生的精锐部队——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因指挥失利而自杀。接着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等城市先后解放。从此华北地区的局势急转直下，原綏远省归綏市的气氛也变得十分恶化而紧张起来。省政府各厅、局、处、室大小官职人员人心惶惶，议论纷纷，谁还有心思撰拟



“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案文牒呢？

一九四八年冬季，解放军突然包围了归绥市，准备攻城，而且在旗下营一带已经发现了前锋队伍，归绥市处于兵临城下，四面楚歌，兵力不足，外无救援的处境，尽管当时的军事将领和行政长官们一再设法激励士气安定人心。但也扭转不了大资本家、大地主老财们“走投无路，坐卧不安”的恐惧状态。

随着局势的突然变化，归绥市进入戒备状态。调兵遣将加强布防，动员市民公职人员构筑城防工事。同时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术。在新城东城门楼上的大炮掩护下，出动骑兵部队，白天去白塔方向扫荡，晚上又全部回城严守。与此同时，组织了大批行政人员，配合军警宪共同执勤，分区分片清查户口，把守城门要道，盘查往来行人，严防共方人员潜伏城内，以免造成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败局。结果自己给自己制造了更加恐怖的气氛，使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惶惶不安之中。

## (二)

一九四九年春，省政府根据上述形势和实

际情况，决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的所在地陕坝（即杭锦后旗陕坝镇）成立“绥西行署”。其目的无非是加强对河套地区的管辖，发挥行政权力和作用，以及在迫不得已时，为省政府迁回旧址作好准备。

在人事配备上，任命了原绥远省政府民政厅长王则鼎为行署主任。原河套地区专员陈国祯为副主任。各科科长、科员、文书、事务等分别由原专署人员中选择委任。雇用秘书、会计、译电等人员由民政厅人员中选拔委任。这次我也被民政厅调往“绥西行署”。

为了避免民政人员赴“绥西行署”上任后再接家眷往返徒劳，所以决定凡带家眷者与眷属同时起程去陕坝，各户准备妥当之后，全部人马统一离开了归绥城，第一站先抵包头，受到当地官方人员的欢迎接待。

当时包头至陕坝之间，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公路，往来其间的是装满货物烧着木柴的卡车，使用汽油的车极少。旅客们坐在货物顶上，在车身颠簸甩动下极不安全。更头痛的是车辆破旧经常抛锚，修复后还得由旅客推动发火，

当时人们编了个顺口溜是“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修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省政府为了解决我们的交通困难问题，给我们调派了一辆使用汽油的卡车，大家不用挤在装满货物的顶上，去冒危险，觉得十分幸运。

我们把行李放在车厢里坐在上面，向西驶去。汽车在不平的道路上颠簸摇晃，滚滚黄尘劈头盖脸而来，人们头上、脸上、脖子里、衣服上罩了厚厚的一层尘沙。烈日晒得汗流夹背，汗水在脸上冲成一条一条小溪，孩子们在尘沙、干渴、震荡里哭个不停……。

最感到痛苦的还是新上任的王则鼎主任，他患肛门痔漏病，本来已是十分疼痛难忍，再加上车身震荡，使他更加坐立不得。大家为了照顾他，把他安排在车厢的前部，让他干脆睡下，同时把床单四角捆在车厢栏杆上，为他遮日避土，以期能熬过这段艰苦的旅程。

汽车经过西公旗、安北县，于傍晚到了五原县。晚上在戏院召开了欢迎大会，王先生拖着沉重的步子，强打精神讲了话，大意无非是勉励大家好好工作而已。

离开包头的第二天下午五六点钟才到达陕坝。王先生一路风尘疲惫不堪，再加上痔漏疼痛的折磨，实在是一动也不想动了，但他又觉得不下车与专员陈国祯所率领的各界欢迎人士见面寒暄有失礼貌，于是艰难地离开了他的“卧铺”，与迎接人员同行，直走到原省银行所在地的宿舍以后，才辞退众人去休息。

### (三)

一九四九年七月，当行署的大小官职人员全部到齐之后，“绥西行署”宣布正式成立。办公处设在陕坝原绥远省银行的后一栋房子里。中央为会议室，东侧为正副主任室、秘书室，西侧为各科室，后面为会计、事务室。当时王先生因病不能上班，有关重大问题由副主任拿意见，其它上行下达例行公文和日常琐碎事务，则由秘书主任晋临祥负责办理。

为了适应当时时局发展的需要，有效地施行政令，及时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从而发挥行署的应有作用，行署实行了定期合署办公会议的办法，出席者除行署各科科长之外，还吸收当

地行政、司法、警察、教育、商会以及驻军城防司令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上传达贯彻上级有关指示，各部门汇报工作或提出问题，共同商讨解决办法等等。

在北平和谈以后，绥远是战是和尚未决定之前，各界人士纷纷揣测议论，莫衷一是，但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主张走傅先生的道路者占绝大多数。主张负隅顽抗重振旗鼓者也不乏其人，在这个时期，由外省流窜到陕坝的杂人很多。有些人穷凶极恶无所不为，有的人则似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九·一九”起义前夕，陕坝的奸商囤积居奇，市场上物资奇缺，粮食、布匹等实物和黄金一日数涨价，法币、金圆券更是一日数跌价。市场上到处有“买一个，卖一个”现大洋的叫喊声，以钞票买硬币，又以硬币换钞票，从中渔利。公务员每月能领一大包钞票，但买不到多少东西，到处呈现出贫穷饥饿的现象。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正当绥远军政高级官员酝酿起义之际，国民党中央军令部长徐永昌

等受蒋介石之命飞来陕坝，并用一架小型飞机把绥远省高级军政长官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也接到陕坝，举行秘密的会议，这么多的重要人物聚集在小小的陕坝镇，接待工作极为难办，为了他们住宿雅静舒适，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塞上新舍”，为了饮食上美味可口，聘请名师备办酒席饭菜；为了会议的安全，责由城防驻军严加警戒。

这次会议除了国民党中央大员和董、孙、刘以及他们的贴身工作人员之外，任何人不能接近会场，也不准透露任何消息。尽管如此，从在场的随从人员中还流露出徐的来陕，主要是企图组织“大西北反共大军”，争取绥远的军政长官继续反共到底。另外把带来的银元黄金作为发放军饷之用，以资解决困难，鼓励士气，并阻挠破坏绥远走和平起义道路。

在会谈期间，陕坝地方上曾邀请他们及随从人员观看晋剧。把席位设在最前排，献上水果、烟茶，使他们享受特殊待遇。演出开始后加演了“宋江杀院”一戏，演员们出尽力气，献出技艺，可是他们中的南方人听不懂晋剧，不

少人中途退了席。我们行署的人员和他们聊起天来，听他们说：“去绥远省城开会不安全，才决定来陕坝开会”。还说“起初以为陕坝荒无人烟，恐怕飞机找不到目的地不好降落，结果来到陕坝以后，看到当地人还不少，还能看戏，真想不到等等”。显然他们对陕坝的情况感到出乎意料。会后，徐等回国民党中央复命。董、孙、刘等因河套地区雨后汽路泥泞不能乘汽车返绥，决定仍由接他们的飞机送回归绥。这架飞机设了几个席位，驾驶员一人系南洋出身的华裔人。坐在飞机左前侧，身后为孙和随从，董坐在飞机右前侧，身后为刘和随从。飞机发动以后，顺着跑道滑行将要离地起飞时，突然发生事故。

原来陕坝机场是个简易机场，规模狭小，设备简陋。为了防止雨后影响飞行，在机场边沿挖了排水壕，水壕附近野草丛生。这位驾驶员在起飞前没觉察到这一情况，以致机身将要离地前，突然向右倾斜了一下，机头便撞在排水壕里。董的头部、臂部，驾驶员的腿部受伤较重。孙的腿部受了轻伤，其余人员由于坐在后

面，飞机震荡时碰在前面人的背部而没有受伤。这场事故是不幸中的大幸，不仅坐飞机者受到莫大的惊慌伤痛，就是当时陕坝地区的公职人员和一些群众也捏了一把冷汗！

事后这位飞机驾驶员怕回去无法交帐，要求我们写了个证明，说清发生事故的原因。这个证明是我起草的。

至于王则鼎先生到陕坝以后，就积极设法治疗痔漏病，结果不仅无效，反而日益严重，后来据医生检查诊断，认为是肛门癌，需要动手术。由于陕坝设备技术差，不能做这种手术，回归绥去治疗也怕无把握，于是他决定去重庆治疗。因为王曾任过傅先生驻渝办事处主任，那里人熟地熟，医疗条件好，所以在准备了一番之后，由王夫人陪同，并由会计主任王圣昌随行去了重庆。会计主任的职务由会计员赵慎策代理。

他们乘坐省府拨给行署的卡车，经银川、兰州等地到重庆后，住协和医院治疗，传来消息说确系肛门癌，由外国大夫动了手术，割除了直肠肛门患部，把肠头移植在腹部，愈后每



次解大便，都得站着用粪盘在腹部接便，便后用布罩盖住粪口，虽然他的生命得救，但在生理上遭到极大的缺陷与痛苦。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前夕，译电员陈秉诚收到绥远省发来的一份长电报，我看了以后立即送交秘书主任批阅。电报内容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和平起义，酝酿准备已经成熟，决定在九月十九日全省正式起义，要求于斯日隆重集会，向军政人员各界人士，以及广大群众，讲明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各项要求等。我们遵照这一指示，在起义之前，通过会议形式进行了传达，并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九·一九”终于来到了，上午十二时在陕坝大转盘广场上召开了各机关团体，各行各业和居民学生参加的大会。会上行署副主任陈国祯宣读了绥远省起义的通电。接着宣布陕坝地区从斯日正式起义，废除国民党的国旗、党旗，取消蒋介石的挂像，誓师在共产党领导下，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可惜当时没有扩音机设备，不少人对电报原文听不完全，但在会后互相传告下，广大群众迅速闹清了电报

的精神和绥西起义的实际行动。从此绥西地区和绥远其它地区一样，正式走向解放的光明道路。

绥西地区起义以后，共产党的干部和解放军并没有立即派来，原有部队、机关、团体等照旧未变，尽管在报纸上、文件上说明军政各界从起义之日起站到人民方面了，然而实际上并无多大的变化，而且对共产党也没有个正确的认识。当时行署虽然组织过大家学政治、学新政策精神等，可是绝大多数人受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以致顾虑重重，根本学不进去。

五〇年元月，绥远省成立了军政干部学习团，抽调全省军政人员四千多人，集中在归绥市麻花板营盘学习，这是起义以后旧职军政人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所学习改造的学校。当时我是行署第一名参加学习的人，在学习期间，除由傅先生讲话，解决了某些旧职人员没从思想上真正起义问题外，还着重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引导人们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使大家逐步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走向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五〇年三月学习结束，根据绥远解放后接管改革等工作的需要，把这些学员分派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去，我被分到财政厅举办的财干班，学习了一个阶段以后，分派到五原县、安北县搞清仓工作，从此离开了绥西行署。

据后来了解，绥西行署主任王则鼎先生由重庆动了手术以后，回到绥远又转往北京，去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傅作义先生，后来听说逝世。

(乌拉特前旗政协供稿)

# 对傅作义在河套时期组建 动委会和实行新县制的回忆

苏希贤

一九三九年秋，我满怀抗日激情，考入绥远省动员委员会救济股当干事。一九四二年实行新县制，调晏江县政府当科员。一九四四年冬，调晏江县和定乡当乡长。一九四六年涉嫌“思想问题”送陕坝被“整肃”，坐牢十个月，一九四七年任固阳县政府人事管理员，一九四八年冬，又返晏江县政府当科员和乡干事，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起义解放以后参加了革命。我在旧政府共做事十年，而且都在河套一带，愿将傅作义在河套时期的动员委员会和新县制时期的所作所为，就记忆所及的见闻片段情况，用粗陋的文字撰写成本文，作为史料拾遗提供参考。由于水平低、文化浅、阅历

少，有失史实之处在所难免，请知情的同志给予指正。

## 一、动委会是为抗战而组织的

傅作义于一九三八年冬天的武功会议上，受命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于一九三九年春，从河曲率三十五军，进驻河套五原县就职。第二年，又将他的绥远流亡省政府从榆林搬来陕坝。在此以前，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阎锡山命他放弃绥包固守太原，因当时敌我实力相差悬殊，以致太原失陷，他的部队元气大伤，本人仅以身免，撤军到中阳、离石一带休整，随后在河曲驻防期间，因和晋西北八路军在多次的抗日战斗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彼此关系搞得很好。他见到八路军在晋西北组织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民运工作搞的出色，所以来到后套后，他就仿照晋西北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样板，在河套成立了绥远省、县、区、乡四级动员委员会。他想利用河套这块肥美地盘，组织民众进行抗战，以期收复失地，扭转全国人民的视闻。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在五原县旧城召开了绥远省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成立大会。延安派来傅部搞统战工作的潘纪文，作了抗日时事报告，内容大意是：只有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抗日胜利才有保障。意义深刻，使人永远难忘。接着全面地展开了抗日救亡宣传动员活动。广大有志爱国青年，在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热情地参加了动委会和傅作义的部队，使傅部大大地充实了力量。动委会组成后，在五原县城内和新公中等地，先后召开了三次动委会干部会议，并建立了基层政权。共产党员乔培新被任命为五原县动委会书记，白扬任五原县第一区区长兼动委会主任委员，刘一山任五原县第四区区长兼动委会主任委员，还有马建华、李牧等同志，亦分别担任动委会的政权工作。省动委会的组长和科长中也有共产党员参加。这些同志和人民同甘共苦，推动和完成了各项抗日动员的艰巨任务。

动委会的组织形式是：省动委会由傅作义兼主任委员，民政厅长袁庆曾兼副主任委员，由

抗战前任过萨县县长的于纯斋任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省动委会下设总务、组训、宣传、社会四个组，组以下设科、设股，另设一个流动宣传队，人员共一百四十五人，比省政府一个厅的编制要大。流动宣传队专门走村串户演戏募捐，以激发人民的抗日情绪。县、区两级动委会，由县长、区长兼任主任委员，设书记一人，主任干事和助理干事若干人，乡动委会不设书记，只设主任干事一人，助理干事一人。四级动委会的干部，一律由省动委会委派，并给颁发傅作义署名的委任状。所有动委会的干部都穿草黄色军装，还佩带蓝边边或黄边边等符号，作为搞战地动员工作的标志。薪金不分职位高低，一律每人每月二十五元法币，以示官兵平等。夏天大部分人还穿草鞋，乍猛一看给人们的印象是颇有八路军艰苦抗战的模样。

乡动委会和乡公所并立。乡长、乡副仍由民选地主、绅士担任。乡动委会和乡公所之间，名义上是平等关系，实际上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如动委会可以稽查乡公所的帐目，动委会的主任干事和助理干事还可以调动乡自卫队，

而乡长则不能。乡动委会和乡公所的职权划分是，凡属骚扰人民的事情，如支应差役等都由乡公所管，动委会不管。乡公所的人员有乡长、乡副、记帐先生、跑乡的乡警等六、七人。对动委会的人不揽那些讨民怨的事情干，颇有埋怨情绪，他们编了顺口溜说：“乡长、乡副，种地、栽树，这就是咱们的任务”。另外还把动委会的人与抗战前的乡建会乡村指导员相提并论，称为“五道爷”，从而挖苦他们管事太宽。区动委会和区公所的职权大体上和乡一样，所不同的是，区长兼动委会主任委员，由省动委会委派，区助理员由区长推荐，由县政府委派。他们不穿黄军装，工资待遇也没有动委会干部优厚。

## 二、动委会开展抗日动员收到成效

动委会的工作主要是组训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把民众按年龄大小，体格强弱，组织起来。男的组成自卫队、担架队、运输队；妇女组成救护伤员队，缝纫洗衣队；儿童组成儿童团。另外，还通过民众夜校、黑板报、墙报，演文明戏、教唱救亡歌曲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其



内容主要是东北沦亡以后，人民当了亡国奴的悲惨情景，并以印度、朝鲜亡国后被奴役蹂躏的悲惨处境，说明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痛苦，从而唤醒民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激发同仇敌忾的抗日激情。通过这些活动，使当时河套地区的广大农村，处处充满了抗日救亡的歌声和抗日统一战线的良好形势，有不少地方可以看到青年男女、儿童团手执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真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一派浓郁的抗日救亡气派。

在傅作义从河曲进套以前，绥远省的大好河山，除过河套和伊克昭盟外全被日寇侵占。当时河套地区的地主阶级和工商界的一些人，开始动摇妥协徘徊观望。五原县商会会长唐兆铭和隆兴长镇镇长康三元等，秘密筹备“临时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日本“皇军”。日本特务机关以及蒙奸德王和汉奸王英等大肆活动，散布所谓“敌强我弱、难以获胜”的恐日谬论，欺骗人民。使河套地区治安混乱，人心惶恐。后来中央骑六军长兼骑七师师长门炳岳，从绥东开来后套，自任绥西警备司令，枪毙了唐兆铭

和康三元，镇压住汉奸，安定了民心。再加动委会大力开展抗日动员等工作以后，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抗日救亡的觉悟，对五原战役的巨大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元月（民国二十八年腊月二十五日），日本鬼子企图“打通大西北”，于是突破乌不浪口子守军（宁夏马鸿宾三十五师）侵入河套境内。占据在五原的日军和伪军共约三师之众，一个师驻在城内，两个师驻在城外，分布于新公中，梅令庙，邬家地，南牛渠等地危害人民。三月十九日，傅作义将军为了收复五原消灭日寇，曾在周密策划与严谨指挥下，命三十五军、骑七师、警备旅等部，全军以赴，一鼓作气，采取“打近战”、“打夜战”、“内外夹攻”、“掏心战”等战术，从而胜利地攻克了五原县城及四乡日伪据点。由于我军出敌不备，英勇顽强，致使敌人措手不及，全军混乱，死伤大半，余者狼狈逃窜。日军水川中将是日本天皇的皇族，逃到安北县的“四柜圪旦”被我军击毙。还由于动委会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做了大量动员民众的工作，所以使五原

战役发挥了人民无敌的威力，取得了大捷，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如五原县金先生村农民王大老虎和王二老虎兄弟俩，带领一把子农民，埋伏在芦苇草丛伏击敌人，打死了十二个日寇和伪军，战后傅作义表彰王氏兄弟为民族英雄。义碾房农民柴贵生被敌人逼着带路，把敌人引进国军的包围圈中，歼灭了一部分伪军。还有许多地方，出现了小脚妇女和儿童抬担架，救伤兵，军民合作打日寇的光辉范例。五原县第三区(在现在的良定图公社)动委会干部，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组织起民众自卫队打游击，使敌伪军没敢到那一带窜扰，保护了人民。汉奸、绥西联军司令王英，乘夜从南牛棋脱逃，光着脚跑到余太，老乡们给编了首民谣说：“有奈出在无奈，赤脚板子跑到余太。”说明日伪军的狼狈形象。

动委会的干部来源：一大部分是原来乡村建设委员会留下来的乡导员；一部分是地方上改行而进来的小学教师，还有一部分人是从社会上招考的有文化的青年。所以人员来自四

面八方，成份相当复杂。进入动委会的人又不追查历史，只要填一份在职干部介绍保证书就行。这时共产党地下党员参加到动委会的人不少。动委会的干部因为跟共产党地下党员在一起工作，作风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遇事也能和群众商量，用开会来解决问题，人人都很拥护。唯地主老财最怕民众在大会上给他们提意见，还怕动员他们出粮出钱支援抗战，所以他们诅咒说：“后套遭了会灾啦”。有一天我到陕坝北边新堂村开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一个地主豪绅，欺我年岁小、身个小、瞧不起我。他咬文嚼字考我古文，还当着群众的面嘲笑奚落我，企图把我顶吓回去。那时我热心热血，壮志正浓，在抗日救亡的激情下，没有被他吓倒，坚持开会，和恶势力顶碰，作了“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抗日宣传鼓动，一直把会开完。地主老财，怕说他们不抗日，所以只好内心反抗，表面上对动委会的干部退让三分。

### 三、动委会被国民党“整肃”

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傅作义还有一些民主思想和进步的作风，河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局面尚能维持，党的地下人员还能存在。自从皖南事变以后，傅作义的政治态度向右摆动，背弃了联合抗日政策，清除共产党员。国民党特务于一九四一年九月间对动委会进行了“整肃”，使动委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先后有二百多人涉嫌“思想左倾”送到战青团集中营，其中有三十多人被送到兰州西训团，随后又转送到西安胡宗南的集中营。

五原战役以后，日寇无力西顾，奠定了河套地区的偏安局面。但从国民党张庆恩、高荣、马汉三等三大特务头目的特务组织，在河套大肆活动，及动委会内的共产党员被清除以后，形势越来越坏，黑暗笼罩了一切。旧职人员中脱离群众，压榨人民，贪污腐化，“烟赌”成风。为了杜绝这些问题，尽管傅作义枪毙了五原县第一区区长兼动委会主任委员王清、临河县永宁乡动委会主任干事武少豪，安北县太宁乡动委会助理干事赵英超等，但无济于事，没有实现傅作义严禁烟、赌、脏的政治要求，仍

然有人在乡间自在为王，为非作歹，经商走私、贩卖大烟，大发国难财，还有人让地主捐种上土地，过上了安康的生活。

#### 四、实行新县制

五原战役以后，傅作义不论是为了抗日，还是为了“防共”，都需要储备和发展力量，以应付未来的变化。皖南事变以后，傅作义由消极清共转向积极反共，再加动委会被国民党特务“整肃”以后，机构瘫痪，已非当日面貌。所以他于一九四二年夏撤销了动委会，实行新县制。当时河套地区只有临河、五原两个完整县，安北除大余太和后山地区成为敌占沦陷区之外，仅留下套内的部分乡、村。这两个半县的体制是：县以下有区、乡、间、邻。实行新县制后裁了区，划大乡为小乡，增加了乡。县直接领导乡，乡以下废间邻制，设保甲制，乡所在地设中心小学，保设国民小学，但多数保没有学校。

实行新县制后，将五原县的第三区划给安北县（原叫设治局），县政府设在扒子补隆。将五原二区和三区划为晏江县，县政府设在塔尔

湖。“晏江”两字的命名，是纪念五原战役阵亡的屯垦军团长贾晏如和三十五军营长赵寿江。将临河三区的一部分和二区划为狼山县，县政府设在永安堡。将临河三区的一部分和整个四区划为米仓县，县政府设在三道桥。“米仓”两字的命名，是纪念开挖杨家河的河曲人，杨米仓和杨满仓弟兄俩的功劳。五原只剩下一区和四区，临河剩下黄济渠以东和庆乐乡以南地区。各县的乡名按统一规定的字排列，并冠以乡名之首，（如忠××乡、平××乡）。五原为“忠字、平字”，晏江为“正字、和字”，临河为“永字、庆字”，米仓和狼山两县为“太字、平字”，安北县为“大、余、太”三个字。所谓实行新县制，其实就是增县、裁区、多设乡，废间邻、设保甲。新县制的乡长由省政府直接委派。

## 五、解决土地问题失败

新县制在政策上实行的是管、教、养、卫“四字”纲领。象废间邻、设保甲是管；乡设中心小学，保设国民学校，县办民众教育馆是教；省设立地政局，整理地籍，清丈余地是

养：训练国民兵，乡公所建立自卫队和巡逻队，并且登记和清查户口是属于卫。但是这些政策都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幸福，却给人民带来不少灾难。如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一九四三年绥远省政府在陕坝成立了地政局，局长为周北峰，在河套地区整理地籍，清丈余地，其办法是：（一）查核地契，计价留地。（二）余地归公。（三）余地在十顷以上者一律公营。（四）余地在十顷以下者，丈放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做是本着当时省政府提出的“铲高垫低”的政策。但结果十顷以下的余地，多为一些捷足先登的中、小地主和军政官僚人员所占有，同时给一些大地主造成以劣地换好地的机会，而真正无地少地的农民却是寸土未得，不但“高的没有铲，低的没有垫”，相反却出现了更多的中、小地主，加重了地租剥削。当时有的地主预收高额租粮或租金的一大部，以至全部。有的地主按“对成”、“倒四六”、“倒三七”、甚至“倒二八”向农民分要租粮租金。农民除负担地主的租粮、租金外，还要负担反动政府的军粮、田赋和苛捐杂税。在这样



层层苛索暴敛之下，农民终岁勤劳，有的不得温饱，有的无力交纳地租和官粮，酿成卖儿卖女，倾家荡产。当时一些佃农以沉重悲痛的语气说：“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抓兵要粮受不了”。

在未实行新县制以前，河套地区的农民，既受傅作义各级政府的统治，又受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屯垦队的剥削，地方上既有国民党委派的官吏，又有屯垦队的营长兼乡长，农民两头纳税，两头出差，负担沉重。屯垦队种的地并不多，把大量的土地出租不劳而获。他们实行“丈青制”，春天出租，秋天丈量，以绳为准。地主老财和一些富裕户，与丈青人员拉拢者，给他们吃点好的，拿点硬的（现大洋）便可以少丈或不丈。贫苦农民无力以报，就得“实丈实”，并任其乱报，加重负担。至于屯垦队的官员，上至团长，下至班长，都私人出租土地，放高利贷，大发其财，贫苦农民过着“场上刚打完，粮食尽送完，租粮要个尽，终年无温暖”的窘迫岁月。民谚有云：“肥了大户，饿死小户，出差出钱是中常户，屯垦队的官员

是大肚”。

## 六、拿上绳子和棍子

新县制实行后，傅作义为了征兵需要，仿照日本人的办法，给河套人民发“良民证”，发证时就便登记户口，稽查“汉奸坏人”。同时由省政府发来“十二属相岁数对照表”，各乡乡长干事沿门逐户查问壮丁属啥，观察面貌，辨识壮丁的真实年龄。好多人为了不当兵隐瞒了年岁，忽略了虚报属相，以致四十岁以里的人，纵然留下胡子，亦混充不成老汉，想逃避当兵万不可能。被抓的壮丁，岁数不论大小，身体不管好坏，兄弟不问几人，只要是男人，就把你抓去当兵。正式命令抓过七次，平时还要乱抓，有一首民歌云：“七期是老汉，乡公所来打扮，剃头刮胡子，才把个脑袋换。”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当局一声令下，把后套的适龄男人全部征召入伍，充当了反共内战的炮灰。征召的办法是：以乡为单位，组织全县党政军警人员和保甲长保队副一齐出动，半夜三更，突然袭击，包围村庄，挨户从被窝内

抓人。被抓者的父母妻子哭哭啼啼，拉拉扯扯，他们追到乡公所跟到县政府，不忍分离，他们痛哭流涕地向当官的抓兵的苦苦哀求；有的哭诉他只有一个独生子，被抓兵以后没人养活，有的哭诉她男人抓走以后，一个人怎么种地，养老送终，抚育子女；杂乱的哀求声，此起彼伏，凄惨的呼天喊地声，惊天动地，实在叫人心酸落泪，不忍闻睹。抓兵的结果，造成很多户家妻离子散，生离死别。

新县制实行后，县政府增设了军事科和田粮科，乡公所增设了军事干事和田粮干事，保增设了保队副和保干事，这些人一年到头的主要任务是，拿上绳子抓壮丁，拿上棍子要军粮。当局还规定乡长抓兵要粮有成绩者就能升官。如狼山县蛮会乡乡长张亨信当了晏江县县长，晏江县和利乡乡长薛佩印当了安北县县长。米仓县的一个乡长邢继周为了往上爬，抓兵要粮急起直追，大卖力气，他的办法更残忍，一种办法是把欠粮户押起来，谁不交粮就不让谁回家，直到写下交粮保证书，按上手印才放回家，另一种办法是在三九寒天，把欠粮户剥去

衣裳，关在碾磨房挨冻。最可恶的是捣毁欠粮户的锅灶，把耕牛杀掉，逼的农民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端着破锅，提上牛头进陕坝城请愿告状，当时的省政府为了缓和民愤，把邢继周送到军警督察处呆了几天，又派到晏江县当了乡长，不久他娶了地主的个大大闺女为妻，骑上高头大马，开始“大刮地皮”，吸吞民脂民膏，没人敢言。

## 七、新县制时期的“三大害”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河套流传着一首民歌：“后套有三害，抓兵、要粮、高利贷”。傅作义自从一九四一年背叛了联合抗日政策，清除了共产党人，立即变本加厉地残害人民，当时河套社会，一没有民主，二没有自由，各处都布满了特务。苛捐杂税之多、之重，古来罕见。人们议论起来说有七十二种税之多。

旧政府的各级行政人员，借抓兵要粮之苛政，贪污自肥，横加压迫劳动人民。如晏江县正新乡乡长侯永昌，抓兵要粮时，手中常提一

根粗棍，穷苦农民交不起军粮、杂税，稍有推诿，立时就给你一棍，侯永昌的口语是：“后套人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棍，不识好歹”。自以为他这种法西斯手段高明，（侯永昌民愤极大，有人命，一九五一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五原县平太乡乡长史发昌，赤手空拳走马上任，时间不长，刮到手上二百余只绵羊，并大量地置买土地，出租剥削人民。

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套人民历尽艰辛，出人、出粮、出钱，已经精疲力尽，但那是抵抗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所以人民再艰苦亦忍受下来，没有怨言。广大人民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盼来了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人民欢喜若狂。没料到刚一胜利，反动政府却又借口“剿共”，大打内战，置民族生存于不顾，加在人民头上的“三征”（兵、粮、税）之苦，不堪言状，整个新县制时期的苛政，比没有实行新县制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建立了新政权，人民当家作主，重见天日，坠入黑暗深渊的劳动人民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五原县政协供稿）

# 伊斯兰教在陕坝的传播与发展

王维孝      马生林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是公元七世纪初，先知穆罕默德首创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以后在世界各地获得广泛传播。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六五一年，是通过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的。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差不多和世界伊斯兰教的历史一样悠久。

陕坝地区的伊斯兰教是在一九二四年左右传入的。当时陕坝早已有了天主教堂。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人民生活日用品主要靠水上交通工具——木船，从宁夏一带运输，船夫牛强（群众称“牛二爷”），先是从黄河水路上由宁夏石咀山一带给三盛公教堂运输。日常生活用品；后经三盛公教堂介绍，又给陕坝地区的教堂运送货物。通过经商的途径，牛强与天主教

堂的关系逐渐好起来了。那时，宁夏国民党反动军阀马鸿逵，残酷剥削宁夏人民。年年抓壮丁，月月摊派苛捐杂税，弄得人民生活贫困，不能安居乐业，由于社会环境和生活逼迫，牛强就从三盛公迁移到陕坝定居下来。随后，他的一些亲友也先后迁到陕坝，当时约有十多户回族人家。回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与回族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回族人民只要居住在一起，就要建立清真寺，清真寺是教徒过宗教生活的场地，也是伊斯兰教活动的场所。

一九二六年，十几户信教群众，自愿献款买了名叫何强(汉民)的三间土房，修缮后做为临时清真寺(礼拜堂)，可容纳30—50人在内礼拜。该寺第一任教长是杨三阿訇(宁夏人)，管理清真寺事务的学董是牛强。

自从陕坝初建第一座清真寺以后，随着该地区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呼包二市及宁夏一带的回族工商业者来陕坝经商的越来越多，其中定居下来的工商业者也逐年增多。到一九三五年，回族已发展到60多户，他们中有的开饭

馆、旅店，有的摆小摊，也有跑行商的，还有少数种地务农的。信教群众大量增加，旧有的礼拜堂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就又筹划扩建清真寺。

就在准备动工时，却遭到陕坝附近天主堂的阻挠，后来由牛强出面与天主教交涉，允许建寺，但提出限制条件“清真寺的屋脊不能超过天主教堂”，怕压了天主教的风水。在当时，陕坝天主教的势力强大，慑于他们的威胁，伊斯兰教准备扩建的清真寺，只能盖成六间大的平房，可容纳150—200人在内礼拜。

扩建后的清真寺先后由马治坊阿訇、大小二力阿訇、陈大阿訇、金舍阿訇任过教长。管理清真寺事务的有牛强、张五爷、杨回回、马三乡老、杨宝善、何占隆等人。在这个时期还开设了阿文小学，由阿訇教儿童学阿文和宗教知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期，邻近河套地区各省区的商人前来陕坝经商的日益频繁，这时的陕坝也已成为河套地区商业十分发达兴旺的地区。与此同时，迁来陕坝的回



民人数空前增多，成分也复杂，不仅有农民、工商业者，还有少数的官僚军阀、逃亡地主，等等。到一九四八年，回民已增加到400多户，人数达1300人左右。群众纷纷献款再次扩建清真寺。在杨万选教长的倡导下，各地区的穆斯林也积极支援。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动工，同年十一月竣工，终于建成了一座15间大的清真寺，里面可以容纳600余人，基本上满足了广大教徒聚集过宗教生活。

回族的居住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凡是回族集中的地方一般称为“坊”，每坊必建一座清真寺或亭子，寺的规模大小由坊民的多少和经济条件而定。清真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各坊各自管理本坊的教务，互不干涉任何宗教事务。现在杭锦后旗的回民大多数分布于陕坝、跃进、光荣、友爱等社队，现有清真寺两座（陕坝、园子渠），亭子三个（光荣联合四队、南渠交通五队、四支友爱二队），这五处寺（亭）基本上方便了教徒过宗教生活。

清真寺的管理体制是：首领是教长（开学阿訇），他是由坊委会负责人组织教徒协商选

举本坊或外坊品学兼优的阿訇担任，一般任期一年，也可连任数年。每坊都有教徒选举产生的坊委会(由3—5人组成)，主要负责管理本坊宗教事务。伊斯兰教的一切活动经费，都是依靠教徒自觉自愿的乜提(施舍)来维持的，自古以来，伊斯兰教就是这样自力更生开展宗教活动的。

(杭锦后旗政协供稿)

# 河套基督教会组织发展概况

聂思聪

## 一、基督教传入我国

基督教传入我国，最早是唐朝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由小亚西亚从陆路传入西安，称为“景教”。唐朝曾盛兴一时。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列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帝国主义者强迫清政府所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中，写入“传教特权”的条文，证明了各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进行侵略的事实，开了所谓“治外法权”之门。这段丧权辱国的历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从而清除了我国基督教的耻辱。

## 二、中华基督教名称的由来

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所谓“传教差

会”，疯狂划分传教势力范围。各教派遍设“教会学校”及所谓慈善事业机构，（不通过我国教育部备案），享有特权。在当时社会情况下，有不少市井匪类、不法歹徒，借入教为名，依仗洋人势力，欺压百姓，激起爱国人士的公愤。如清末义和团农民起义“灭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所谓“教案”产生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群众运动达到高潮，有“打倒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口号，外国传教士，纷纷逃往上海租界地。爱国的基督教徒目睹教会前途，痛恨帝国主义分子利用不平等条约内的“传教特权”，给中国基督教造成的耻辱非常痛心，因而有许多爱国爱教的有识之士（如余日章博士、陈敬怡博士、丁玉彰、贾玉铭牧师等），发起创办“中华基督教会”。号召信徒脱离“外国差会”，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因此全国各地都有创办“本色”教会之举。陕坝信徒也是受此影响，挂起“中华基督教”这个牌子的。

### 三、基督教各教派发展概况

后套教会最早在“扒子补隆”（即现在兴安镇）。据知系庚子赔款创办的。先是美国人办，后由瑞典有名望的“费安河牧师”主持（年日记不清）。据知原系赔款地四百顷，但实际从王爷府那里拨了八百顷开了所谓“洋人渠”，这个差会还发展到五原。

#### 四、陕坝基督教会的设立

一九三四年左右，由呼市自立会的（又称神召会）李金彪牧师（中国人），差派该会李道祥牧师与该会长老张献清来陕坝开设教堂，地址在天主堂东杨三秃院附近。不久又派来梁羨功主持，信徒约有五十余人。在抗日战争前后是属于呼市自立会的。

日寇侵华，内地来后套者甚多，其中也有不少信徒，因而有人倡议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有商人韩子云献地四亩（即力车厂地址），张岐山（商人）、王壁（商人）、王玉山等人被选为执事，筹建礼拜堂，以后张献清、梁羨功参加，此乃一九三八年事。一九四〇年崔玉山住于教会，主持会务，选五原来的成仰甸任长老、王

加山为传教师。每主日聚会约百余人。接近抗日胜利，薛博五(绥远省救济院院长，现任呼市政协办公室主任)将自己靠近教堂的房院献于教会，该房院曾为教会所用，后来不知如何落于私人手中。

该教会执事、长老实行选举。除前所提初建教会等人外，还有胡启明、薛得恩、孙振州、王守芝、孟召义、马秀珍、董改连、祁玉贵、赵承恩等当选过负责人，传教师有李华亭。在解放前后，信徒约有三百余人，以后实行“教堂合并”。

## 五、基督教聚会处

这个教派的起源和时间，亦在北伐时期。它主张脱离“差会”，并强调脱离“宗派”，(分门别类的各个派别)，统一“地方教会”，故名“聚会处”。开始由福州和上海几位知名信徒发起，(如倪析声、李渊、汪佩贞、李常受等)，到抗日时期曾遍及全国。陕坝聚会处是在一九四五年前成立的。发起人是傅作义三十五军秘书王钧佐、参议陶谦、暂三军

医院院长郭致耀。此三人是朱帮仁介绍傅作义的(朱系医学博士、五原耶稣家庭家长)，王、陶随军东去后，由郭致耀、杜津桥、袁锡庆、赵旭东等人主持。先赁后买大转盘孙某院落，建立了聚会处。到解放前后约有信徒五百余人；到一九五三年增加负责人李庸九(已死)、王若仁(去太原)、阎秉智、聂思聪。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政府帮助教会清洗了暗藏的反、特分子，使教会纯洁健全起来，由阎秉智、张殿魁负责。

## 六、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五〇年有基督教四十多位知名人士，在周总理接见启发后，向全国信徒发出革新宣言。不久，成立“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全国信徒纷纷拥护成立三自组织，我们河套所以迟到五六年才建立这一组织，是因我们有人片面认为，我们的教会与“差会”经济人事都无关系，从开始就是三自教会等等。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散播毒素，从而削弱信徒爱国思想、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经过领

导组织学习各地反帝爱国材料，受到启发，于一九五六年初，建立“河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一届主任是李华亭、副主任张殿魁、委员有王德荣、胡启明、于伯加、陈彼得(兼秘书)。五八年教堂合并，改选爱国会，主任阎秉智、副主任李华亭、张殿魁，委员有于伯加、王守芝、王德荣、聂思聪(兼秘书)。爱国会初成立，由专署宗教科领导，各旗县成立爱国学习小组。教牧人员订立爱国公约，一年进行1—2次检查评比，因而思想大有进步。五八年全盟成立“宗教通讯小组”，由盟民政处领导，组长是民政处长李瑞林，副组长有天主教郝威，基督教聂思聪。任务是及时反映学习情况和爱国公约执行情况，加强反帝爱国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五八年爱国会改选的同时，将聚会处和中华基督教会合并，实行联合崇拜，建立了“教务管理委员会”，选聂思聪为主任，李华亭、张殿魁为副主任，王守芝、孟昭义、王德荣、于伯加为委员。将大转盘聚会处全院交房



产管理所使用，同时献出20个大条凳。

在党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来，信徒对党的政策满有信心，好多年我们不知道的信徒，露面参加崇拜，且有新信教的也要求受洗聚会，证明党的宗教政策深入人心。我们将竭尽全力、利用聚会贯彻党的宗教等各项政策，使广大信徒坚决走爱国爱教的三自道路，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四化贡献力量。

（杭锦后旗政协供稿）

# 临河李记“德和泉”的兴败

杨自立、张美欣、刘培荣、梁杰走访

刘培荣整理

李记“德和泉”的创始人李振山（绰号李山垮子），于满清同治末年流落到临河，直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时将近八十年，经历了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三年之清廷专制到民国三十八年来的讨袁护法、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统治。从李振山安家立业、李增荣（小名银科，别号仁甫）之发家致富，到败家子李元贞（别号干臣）手上，将树大根深，誉满塞上的“德和泉”挥霍殆尽，付诸东流，它的兴衰历史，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 一、李记“德和泉”的起源

开创人李振山，原籍河北省枣强县李家行村人，在满清同治年间，李振山和二弟李振江、三弟李振海，在青壮年时，即投奔中岳嵩

山(河南登封县境内)少林寺习练武术拳法，为时二年后，因学得了些少林寺武术，便辞退师傅下山，以保镖为业。兄弟三人首次出马保镖，是护送伊克昭盟杭锦旗王爷进京朝圣后，返回旗府。他们由京启程，路经张家口、大同，绕道神木，将王爷护送到旗府，完成保镖任务，领得酬金后告辞返京。第二次是承保清政府一位出任四川的府台大人，不幸途经山东兖州，遇匪徒十数人打劫镖驮，李振山兄弟三人挺身护卫，因寡不敌众，二弟李振江被击殒命，李振山亦负伤败逃，三弟李振海则潜入深山溜回原籍，所保之府台大人也下落不明，李振山怕官府追查，遂窜到萨拉齐隐身，后来跟随大户李红娃来到后套。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李振山先给五原大地主王同春当长工，偶而在与同伙游戏中显示了两手武术，受到人们的喝采，给他送了个“山垮子”外号。王同春得知李振山会少林武术，大为赏识，不但叫他当了保镖人，还让他担任了牛犊头和管家。

在李振山当管家期间，巴结上了一些蒙古

贵族，当他认为有条件独立起家，实现发家致富的愿望时，就摆脱王同春，去投奔蒙古贵族章盖。他一方面对章盖百般阿谀奉承，以取得章盖的信任，一方面又与章盖的老婆通奸，从而获得了章盖的两顶蒙古包、二百多只羊、四十余头牛、十五匹马，以及其它财产，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家业。以后又和一个蒙古女牧主那林包图大臣的老姑姘居，取得对方的欢心和信任后，接收了那个女人的家产。这样李振山（山垮了）发了家，在临河魏羊地一带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牲畜，便开始雇工。一面种地，一面放牧，过上了地主阶级的剥削生活。以后又包下蒙古贵族的十几顷土地，转租给佃户。这时李振山的家业，已发展到六十余顷土地，七十头牛，三十匹马，三百多只羊，这可谓是李象的初盛时期。

其时的河套平原，正如过去所形容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是个杳无人烟，一片荒凉的大草地，红柳丛生，芦苇遍地，虽然相隔百里左右，就有一座喇嘛召庙，但庙里的活佛和喇嘛，整天只是诵经念

佛，很少与社会接触，只有不当喇嘛的蒙人，才和汉人来往，彼此做些互通有无的交易。

后来三弟李振海也来临河魏羊地住（今城关公社），他兄弟二人与府谷人魏二处的很好，当魏二与强家油坊的强二，因浇水放坝发生武斗时，李家兄弟为维护魏二的渠坝，打败了强二结伙挑衅的野蛮行径，从此李振山兄弟声威四扬，称强一方。除了得到魏二对他的酬劳以外，那林包图大臣的老姑，也将东至准格圪旦，西至大渠畔，南至魏羊地，北至丹达木头，约有近千顷土地，统统划归李振山承包转租。与此同时，他又倒贩蒙人的牲畜皮毛等土特产品，运往包头出售，回程又买些茶、布、烟、糖卖给蒙人，往返双重获利。这时李振山经边客介绍，与神木县知事的遗孀，结为续弦之妻，于清光绪十一年生一男孩，为了同前房所生之李银娃排行，起名叫李银科。他又回到原籍将家中老母及姊妹等人，也迁来魏羊地，安家落户。（那时临河仅是萨拉齐县五原厅所辖的一个区）。

光绪二十三年，阿拉善旗达王，聘李振山

弟兄到王府担任武术教练，把陶来图一带约二十余顷蒙地让给李振山经营，阿旗每年只要微小的一点报酬。李振山弟兄们在拥有大量土地后，急需开渠拓荒，接挖了兰琐渠，开挖丹达木头渠，后来为了扩大家业范围，寻找更多的赢利，遂在包头设立了“德和泉”字号，这就是李记“德和泉”的起源。

## 二、兴家立业的过程

李振山开创家业的事迹，在后套地区来说，仅次于王同春。长子李银娃（官名李生荣）一生庸庸碌碌，无所成就。尤其品德败坏，不齿于人。次子李银科（李增荣，别号仁甫），勤劳狡猾，善于钻营，具有事业心，还有一套处世接物兴家立业的本领，从小就在父母的循循善诱下，熟悉农牧劳作。当时虽然家境小康，但要想读书成才，谈何容易，所以李银科没有上过一天学，是个目不识丁的富家子。但练达人情皆学问，他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施展经营本领，进一步创设了发家致富的局面，他勾结官府伺机霸占土地，对长工佃户施以小恩小

惠。自李银科当家以后很快和五原县垦务局长、大地主伊新才结成莫逆之交，在垦务局放地的时候，他乘机买了八百顷地。后又包下蒙旗干召庙、小召滩及马场地的一些土地，使临河“德和泉”老柜（即现在的丹达公社水桐树大队）成了扩大其家业的基地。这是李记“德和泉”兴隆茂盛的鼎盛时期。其后李增荣拜马福祥（当时的绥远都统后调往宁夏）作干爹，并与马鸿逵、王英结为盟兄弟，以壮大声势，保全家业。

一九一三年，由李柜出钱，佃户和雇工出力，挖通了丹达渠，李增荣采取因人制宜，恩威并施的办法，调动长工、佃户们的积极性，并量材使用把一个跑差的小徒工李子英提拔为管家记帐先生，接替了傅乐山的差事，直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在李元贞（干臣）执掌家业时，又提用郭永海为当家先生，在李干臣的放手使用下，成为李记“德和泉”的总管家代言人。

民国十一年至十四年之间，河套地区的哥老会横行无忌，借帮会之名，行敲诈之实，扰

害人民，为所欲为，而李增荣（银科）颇能顺应加以拢络。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军队过境退往陕甘宁时，后套的哥老会兴风作浪，十分猖獗，纠集乌合之众，成立起独立队，奸淫妇女，拦路抢劫，到处请财神（即绑票）。大户地富和稍有余钱的人们，一听请财神这三个字，无不惊魂失魄，毛骨悚然，就连一般劳动人民也害怕独立队，闻之心悸。而李记“德和泉”则置若罔闻，若无其事，其中的奥妙很值得加以剖析。用他们的话来说，“既要逢迎坐轿的官宦，也要为下拉棍的穷人，人有贵贱，各有用处。尤其不能得罪拉棍的人，如得罪下这类人，随时有打掉你前门牙的危险”。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曾在河套逞凶一时的匪首杨猴小，带有千余人马，自封为骑兵师长，听说“德和泉”有匹闻名的“千里驹”走马，便派人借用，而李增荣则很慷慨地让长子李干臣亲自送马上门，以讨取匪首的欢心。再如对背上口袋上门要饭的乞丐以及大烟鬼之流，他也不时给点施舍。在“德和泉”东西两柜，设有大伙房，东西顶头大炕，可供百余人住宿，支应“穷汉”们吃



住，用以解消对“德和泉”的恶意。在接官迎贵方面，百般讨好于人，民国十四年秋，临河开始设治，萧振瀛来临建政时，李增荣迎接到“德和泉”接待，让出较好的房间，作为县署办公地址。由于李增荣的殷勤款待，当临河以“永庆太平”四个字的顺序划分一、二、三、四区行政建制时，李增荣在萧县长的提携下，担任了临河一区的董事。从此他政治上有了门路，助长了李家经济势力的扩展。自此李记“德和泉”进一步成为权贵盈门，财源兴发的豪门巨富。李记“德和泉”在发展农牧业经济的基础上，又大肆进行商业投资，开设百货及粮店等买卖，从而把李记“德和泉”引向鼎盛时期。

### 三、土地占有和农林牧副多种经营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为了开垦荒原，移民实边，指派贻谷为农垦督办，钦令达拉特旗、杭锦旗报垦放地，并于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垦务局，掌理放垦事宜，在后套地区先后放垦三次，每顷地向挂领人只征收五十到八十元的地价，并发给土地执照以便经营，地价分期交

付，五年内还清后，土地所有权则归私人所有。李增荣在垦务局三次丈放土地中，都不遗余力地设法购买，最突出的一次就买了八百顷，连同前后挂领和承包蒙地在内，共约有二千二百余顷（一顷地为百市亩），上述顷数包括荒沙碱滩在内，分布于现在的临河、杭后、磴口、三个旗县境内。由于地多面广，鞭长莫及，因而形成雇工自营地、包租转租地和佃农承种地等几种类型，并分设出魏羊地、王爷地、东柜、西柜、九季、后束坝、郭廷驹、小召滩、新台地、南台地、北台地、应四地、西牛犊等十几处牛犊，分布在临河、磴口等地的城关、建设、丹达、黄羊、白脑包、干召、小召、陶来图八个公社的范围。就以临河丹达公社老柜附近的牛犊来说，计有南牛犊（今永胜大队），七里生官牛犊（今新利大队）。而魏羊地、公产地、份子地、王爷地、陶来图等处牛犊，还不在于其内，仅丹达木头之地界，南至吴马贵（今干召公社永丰大队），北至公产房世成西（今建设前进大队），东至兰琐河，西至黄济渠（今丹达永胜大队），延伸到邓泥圪卜白脑包一带，计可

耕地面积将近一千顷，加上千召庙周围有地约六百余顷（包括荒地碱滩）。魏羊地（今城关万丰大队），约近三百顷（可耕地一百八十顷），东小召承包之善召地四十余顷（可耕地约计二十几顷），水桐树大队自营地一百二十余顷，公产（即二里五）六十余顷，份子地挂名六十余顷，共计一千一百余顷。总计李记“德和泉”占有的土地，虽系二千余顷，但除了荒沙碱滩，无法耕种者外，实际能够耕作的土地，不过一千五百余顷左右。（关于磴口陶来图一带之领地，因数据不详，未计算在内）。

李记“德和泉”的常年自营地约有八百顷（八万市亩），多是黄土拉亥河畔到兰琐河之内的土地。每年各个牛具雇用的长工，不下二百五十余人，农忙时雇用的短工，通常亦有五百人上下，每顷地平均产量，如以五十绥石计算，年收获粮食可达四万石（每石三百斤），除去籽种及所有长短工等项开支约有一万石外，可净余三万石之纯收入。

包租转租和出租土地大约一千余顷，承种“德和泉”地的佃户，据说有五百余家。每顷

地就以低租额十石估计，每年可收租粮一万余石，而每年所收获的粮食，除备耕备荒囤积一部分外，其余大批地从黄河运往包头出售。民国三十八年内地遭荒旱，粮价飞涨，每石粮食售价高达三十块银元，大发了一批“灾难财”。“德和泉”自备有两只大船，从河路上运去粮食皮毛等，购回布匹烟茶及其它杂货，进行往返双重取利的生意。

“德和泉”所占有的土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牧主召庙手里包来的，例如包干召庙地一百多顷，一年只出二十四两银子，即可收取租粮五百几十石，简直是一本万利或无本得利。

李记“德和泉”在旧政权时代，就成为临河县最大的地主，其拥有的土地，遍及永康乡（丹达木头）、永宁乡（干召庙）、永兴乡（城关魏羊地）、永嘉乡（世成西）、永灵乡（七里生官）等三分之一的乡村。在牧业方面，牛、马、骡、驼、羊成群。据不完全统计，有牛五百头，骡马一百二十多匹，骆驼八十峰，羊一千一百余只，另外还有二百多口常年在圈存养

的猪。

在副业方面，东柜西柜几个主要牛犊点，都有油坊、缸坊、粉坊、碾磨坊，以及铁木工坊，分别责成专人管事。

在林业方面，计西牛犊树园三百余亩，丹达二百八十亩，魏羊地八十五亩，其它各牛犊的小量植树还不在于其内。另外在果木树的栽培上，丹达老柜试种了三亩海红子，亦不无收获，仅木材的收益，每年亦不下一千几百块银元。

李家大小四辈，总共不过十六口人，却豢养着大小管家，各种头目，以及厨师、丫环、老妈、裁缝、车夫、随从和家兵等约有六十余人。至于各个牛犊的管事头目，有外头（管丈量土地收租粮）、跑渠头（管渠道浇水）、下马头、又分作站院头、管库头、上马头、与引人头（管出勤生产），所有这些人都是为李记“德和泉”信任的、能够忠实为其效劳的“狗腿子”。

丹达木头是李记的总柜，筑有围堡。庄子的周围，是一道高一丈，宽八尺的围墙，周长

一里多。围堡的四角，修筑有岗楼。庄子共分三层院落，有房一百余间。最外层是长工们住的地方，和大伙房、牲口棚圈。西院是帐房、油坊、缸坊、库房和粮仓。东院是李银科（增荣）家属住的地方，门口设有家兵站岗，不许佃户与长工们随便进去。炊事分为三个灶，长工吃大灶，伙食粗粮淡饭，管帐先生和管事头目吃中灶，菜饭较好，李家大小人等吃小灶，每餐精米细面，猪羊鸡鸭，肉食满桌，间或还吃山珍海味等奇缺食品。民国八年建盖水桐树庙，十一年大修为李柜的家庙，养活着和尚二十人，其中陈俊为当家和尚。

#### 四、整修水利简介

民国十三年，李家筹集了资金，并在绥远都统李鸣钟贷款支援下（这时马福祥已调宁夏），由李银科担任经理，开挖了丹达木头渠，全长八十多华里，日出民工三百余人，连续挖了三年时间，才竣工放水，丹达渠具有干渠的容水量，灌溉面积达一千多顷，除李家受益外，对其它地户和佃农亦不无好处。

开挖三大股渠，此渠系李银科(增荣)、赵银富、田喜亭三股合资挖成，由马场地起，经过临河永胜、永嘉两个乡境至挑园公，渠长九十华里，宽四丈，深五尺，灌溉面积五百余顷，经连续几年开挖，于民国十九年始告完工。

整修魏羊渠，宣统元年由魏二开挖，因中间淤塞十余年之久，不能浇灌，后由李庆荣经理挖修畅通，该渠由塔尔湖起，经永兴乡到临河城关西门外，渠长二十八里，宽一丈，深四尺，灌溉面积八十余顷。

接兰琐渠。此渠原系天生壕，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由垦务局挖成，宣统二年由李振山(山垮子)管理，连续修挖，迨至民国二年李增荣(银科)担任经理，由永济渠口西起，经永胜、永宁、永康、永福、永嘉等乡，到达拉地为止，渠长七十五华里，宽四丈，深五尺，灌溉面积九百余顷。后来又将丹达渠、兰琐渠改建为合济渠，李增荣任经理，并取得陕坝天主堂邓神甫的同意，又从黄土拉亥河中段开口，修挖了一条支渠，以利用该河的水源，增

加李家水浇地面积。

## 五、商业资本的铺开

李增荣(银科)在掌理家业期间,除在农业、牧业、副业、林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外,为了广开财路,在包头河套等地区开设的商店,计有包头的天义祥,由“德和泉”垫财以袁天贵出名开设的永丰秦粮店,以李银科为财东开设的义隆祥、永合泉,复兴和粮店,亦有其股份。

在临河“德和泉”老柜分设油坊三座,碾坊两座,磨坊两座,缸坊一座。总之,陆陈行生意样样皆备。

在临河的商号,由“德和泉”投资或为财东的,计有元兴西、蚨来号、乾泰兴与合同酱园等四处。在米仓县以“德和泉”资金开设的商店有德义泉,在陕坝开设的有义合成,以胡耀辰、武耀国为掌柜。在五原亦开设有两处买卖,让其女婿党行先经营。

李记“德和泉”商业资本的铺展不仅在后套范围内,其做生意的地区还扩展到平绥线的张家口,以及天津和东北一带。



在民国二十五年前，还没有贯彻禁烟法令时，他将此地所种的鸦片烟，以每两一块银洋的价格，大量收购后，连同李家自种收获的鸦片烟一并贩运到东北等地出售，每两可卖二十五元以上，取得巨利，扩大资本，成为后套地区的唯一暴发户，所以李记“德和泉”的发家致富，是以土地剥削和商业投机结合在一起，双管齐下而获得日益增长的财富的。

其次除临河等地的房产外，仅包头市的房产计在口袋房巷买毛织厂的院落一座，花银一万两。买德和长、荣积成绒毛店的前后两套大院，花银五万两。在包头召梁买房一百余间，南圪洞买房二百一十间，共花银一万二千两。买天德成乔家的院落，东西两个套院花银三万余两。另外东河区马王庙街路南有一套大院，东门大街的两座院落，买价不详。所有这些院落房间，每年获得房租亦在五千银元以上。

## 六、李增荣(银科)的葬仪

李增荣过六十寿辰时盛况空前，宾客盈门，唱了七天大戏，送寿礼的络绎不绝，仅送

的幛子就收了三百余块。过寿不几年，他患了半身不遂病。为了安排后事，专意开了一个砖窑烧砖砌墓。其葬墓按三代顺序建成，正墓、配墓大小十多个墓坑，每个坑子都是用砖拱起来的，正墓面积有三间房大，全以砖盖成。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当李增荣未死之前，目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浪涛将要席卷全国，反动派已面临崩溃的时候，他对往年积欠“德和泉”粮款而又无力偿还的户头，将欠账一笔勾销，帐目全部焚毁，以免后人索要。据说烧掉的帐目中，债户欠粮约三万石之多，欠款有二万几千银元。李增荣此一举动是迫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而藉以收买人心的。

李增荣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八月病故，为其举办的丧事场面，比以往过寿时的气派庞大的多。当他未死之前，就由包头找来了几个画匠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糊葬品，做纸活，什么金山、银山、童男、童女、纸人、纸马……数也数不清。

李增荣的丧事整整办了“七七”四十九

天，到十月十八日发引，每天都有专人守灵，和尚、道士、天天轮流念经。出殡前后半个月内，天天杀猪宰羊，大办宴席，吊丧的人络绎不绝，约有四千余人，据说傅作义、马鸿逵还派代表参加。灵前、村落布满挽联和人们送的黑绸布幛子，灵棚全用白布扎采。出殡那天，李增荣的灵柩，用四十八抬的龙头凤尾大杠抬着，前面的殡仪队，有开路菩萨打路鬼、童男、童女、纸人、纸马、金山、银山，静踱楼，金银斗，摇钱树，长钱幛子，绣球幡子，四合头院，等等，名目繁多，难以数计，一个接一个地已经排出了三里多，直到沙丘墓地，而后面的灵柩还未挪动一步。和尚二十八人装成二十八宿排列，还有道士数人，鼓乐三班，吹吹打打，送葬的亲友哭哭啼啼。送殡的行列从李增荣家院落起，直到沙窝子葬地，长达三里，相继无间。

在治丧期间，常素庙、水桐树的和尚，干召庙的喇嘛，四村百舍，各方友人，前来吊丧者川流不息，对来人就食还发了食证，从早到晚流水席接续不断。李记“德和泉”为了李增

荣(银科)的丧事,据不完全的流计,耗费的钱折合银洋在一万元以上,拿后套各县来说,实在是史无先例的丧事。尤其搭台唱戏,大放官赌七天,筱月仙的山西梆子,昼夜演出,中间还有二人台插曲,看戏的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并且官方还专派去警察十人,士兵两班,维持场面秩序。

## 七、败家子李元贞(干臣)的命终

李元贞别号干臣,其弟李国贞,都是李增荣(银科)的亲生子。李干臣二十岁以前,在包头回民小学及初中读书,二十一岁考上黄浦军校,但未入校接受军训。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后,代其父担任了临河县财政科长,不到二年之后,李干臣调任临河县教育局长,以后又调任水利局长,抗战前曾是伪国大候补代表,名义上任过马鸿逵十五路军参议,以及绥西区防副司令。抗战时期接受了十七集团军总部参议的虚衔和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团长的官职。一九三八年门炳岳任绥西警备司令时,曾让其自筹人马,委以抗日游击支队长。一九三

九年冬日寇入侵后套，揭开了五原战役序幕，李干臣联络当地吕宝山部属田有明等人，组成地方武装，从新公中扰袭五原，战役结束后解甲还乡，随后跑到宁夏马鸿逵那里躲藏避难，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傅作义东去接收失地后，李干臣才回到临河。

李干臣自幼就有向上爬的野心，很想登上政治舞台，显露身手。但由于其父李增荣的阻止，未能得志，因而几次招兵买马都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虚张声势，昙花一现就消失下去。

李干臣一生享乐成性，是吃、喝、嫖、赌、抽的花花公子。虽然娶有大小老婆，但有时还要嫖暗娼，逛窑子，寻花问柳。在日常生活上，奢侈豪华，讲究排场，不时到外地去购山珍海味等食品，滋补身体，尤其好在酒席宴前以酒司令自居，充当饮酒好汉，对赌博更加热衷其事，押宝、推牌九、打麻将样样皆通。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仅仅四年时间，李干臣就将包头的家产，挥霍大半。如在古城湾赌博，一次就输去银洋数千元，又加为其母过寿，大肆

铺张，亦耗费了巨额资财。抽大烟，吸料面，李干臣早已习染成癮，经常和赵钰、崔汝骥等嗜吸鸦片烟的人们，混在一起，结成狐朋狗党，大肆挥霍。

李干臣身高六尺三，体重二百一十余斤，在后套是独一无二的肥大型人，出门骑的是一匹大走骡，随带个护身的武士，武文斌就是跟随他的其中一个，东跑西逛，游山玩景，整天追求个人享受，不理家事，“高高山上晒阳阳，好活一天算一天”。

一九三九年傅作义来后套主持绥远军政，强调禁绝“烟、赌、脏”，这对烟赌成性的李干臣来说，感到很受束缚，唯恐绳之以法。所以就随带武殿臣携带一部分现金和细软财物，从陕坝跑到宁夏马鸿逵那里，借助干爹盟兄的护身符，在银川为所欲为，一直呆到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东进察绥，又加其父李增荣卧病不起，才又回到临河掌理家业。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秋，李增荣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病故。李干臣在办理其父的丧事上，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他葬殓了父

亲，对家事稍作料理后，即去包头进行大拍卖，用以满足他花天酒地，荒淫无耻，苟且偷生的享乐生活。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淮海战役将要结束，平津战役序幕已揭开时，李干臣看到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便回到临河收拾家产，将丹达木头老柜所有的贵重财物，以及枪支弹药等，装上骆驼十余峰，马车七辆，星夜运往宁夏王爷地一带。

一九四九年，随着蒋家王朝的垮台，李记“德和泉”也和其它地主阶级一样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一九五〇年，在党和人民政府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李干臣始返回临河，并假惺惺地向区干部提出加强农村治保，组建集体农场的建议，并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参加了临河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党一再强调要他认清形势，打消顾虑，并反复阐明党的政策。李干臣虽然会上伪装积极，但在会后，却砍伐树木，转移五大财产，准备到外地隐居。当土改工作队进村时，李干臣仍在外地流窜。其后一九五〇年秋征和五一年减租反霸时，从李干臣家里查获

暗藏的手枪一支、步枪一支，以及埋入地下的大烟土两箱、银洋一千多元、银子一罐，还有绸缎等好多财物，因而将李干臣扣捕归案。一九五二年元月二十一日，提交群众大会斗争后，依据镇反条例将李干臣执行枪决，结束了李记“德和泉”三代在临河封建统治势力的历史。

镇压李干臣的罪状是私藏枪支，破坏生产，解放后继续进行不法活动，以及查获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委任状等罪行。至于其母亲迁住包头后自寻无常，他的大老婆畏罪自尽，二老婆管制改造后另嫁他人，胞弟李国贞判处劳改刑满释放后，在包头就业，所遗子女计有黑翠、旦旦及侄女莲莲等，解放以后，在党的阳光雨露下，都抚养成人。

## 八、对当地的影响及其流毒

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而李记“德和泉”也不例外，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他们对移民临河开拓荒原，修建一些渠道上，是起到一些好的作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处遭了荒旱，饥寒交迫的穷苦人，离乡背井，卖儿



弃女，逃来后套，“德和泉”东西两柜都曾开锅放饭。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后套各县风雨失调，普遍歉收，政府号召人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李增荣尚能慷慨解囊捐献米麦一千绥石(三十万斤)，从而也减轻了当地的摊派。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傅作义率部进套，筹借军粮时，李增荣(银科)首先捐献小麦五百绥石(十五万斤)，傅作义为此送给他“捐粮救国”的巨幅牌匾。李增荣平素对待一些贫民和困难户，常假惺惺地给借点钱，给点粮食，以讨取好感。因之，李记“德和泉”虽然是后套的巨富，西区霸天，但表面上看去民愤并不太大。

从坏的方面去看，李记“德和泉”勾结官僚政客，土匪把头，与反动的封建地主势力站在一条线上，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支柱。尤其李增荣在患病期间，托陕北王乐天由中美训练班请来大夫看病，叫佣人李锦明竟把本村赵富的老婆弓秀英(又名弓玉莲)找去，充当女招待，有意让美国大夫玩弄，幸而坚贞不

屈的弓秀英，识破其圈套及不良企图，加以拒绝，才免遭毒手。对此，弓秀英同志在斗争李千臣的群众大会上，曾声泪俱下，义愤填膺地予以控诉。

再加李生荣(银娃)一生庸碌，品德败坏，他仗着有钱有势，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乡里民众，对他愤怒痛恨至极，但又无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而已。还有，李记“德和泉”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以前，为图谋暴利，种植贩卖鸦片，毒化人民，同蒙民作买卖欺骗人，占便宜，不择手段。对蒙汉民族团结，相互共事上，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民国十六年后，李银科(增荣)身为一区区董职位，依仗权势，假公济私，把十几名区兵，二十几支枪，用作护卫家业的私有武装。抗日战争前两年，还雇用家兵，自备武器，计有盒子枪两支，自来得两支，步枪七支，八音子一支，土炮四门，成了河套的西霸天。特别是举办李增荣丧事时，正值秋收农忙之际，开台唱戏，大放官赌，不但影响千家万户的正常生产，对当地及后代也流毒非浅。

自李增荣病危到死由李干臣掌理家业以来，把个树大根深的“德和泉”弄得每况愈下，日益走向败落，由于李干臣弟兄们既没有治家之术，更缺乏生财之道，处世无能，做人欠练、少爷派头和公子性格倒很十足，享乐思想非常浓厚，经年累月沉醉于酒色之中，迷恋在赌博场上，浪荡逍遥影响极坏。

李记“德和泉”从李振山的创业奠基开始，到李增荣的兴旺鼎盛时期，及至李干臣的荒淫挥霍，家业覆灭为止，它的全部历史确有引人深思之处。

后语：本文承乔景明、刘应锦、郝维元、张德荣等同志协助，我们走访了李氏家族第三代李邦贞，曾在“德和泉”当过总管家的郭永海，经常跟随李干臣的武文斌，以及当过长工的刘国胜等知情人，获得了一些资料，特此表示感谢。但因时过数十年之久，许多知情者已先后去世，无法进一步查对核实。所以不尽准确完善之处，在所难免，请有关人士和知情者，提出补遗，并批评指正。

(临河县政协供稿)

# 巴盟文史資料征集撰写参考綱目

(自滿清戊戌政变至解放前)

## 一、政治方面

- 1、有关“九·一九”起义的历史资料。
- 2、有关“三公旗”起义资料。
- 3、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河套政治资料。
- 4、滿清、民国时期“三公旗”的政治资料。
- 5、傅作义在河套实施新县制的资料。
- 6、傅作义在河套举办“抗建会”的资料。
- 7、傅作义在河套推行保甲制度的资料。
- 8、解放前国民党在河套一度实施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资料。
- 9、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略河套地区的历史资料。
- 10、解放前国民党在河套、蒙旗的党务活动。
- 11、冯玉祥“五原誓师”资料。

12、解放前国民党在陕坝举办“中美合作训练所”，“稽察处”的历史资料。

13、国民党时期陕坝的集中营。

14、解放前傅作义在陕坝、八岱等地举办“绥干团”的历史资料。

15、三十年代王鸿一、朱霁青在河套倡办移民活动的资料。

16、阎锡山在河套办屯垦的历史资料。

17、三十年代河套“穷人会”的历史资料。

18、解放前河套及“三公旗”的政治历史人物传略(如巴云英、奇俊峰、王同春、二老财、杨米仓、林沁僧格等)。

19、解放前河套、“三公旗”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及其它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传略。

20、解放前各蒙旗的内部斗争历史资料。

21、解放前匪盗在河套的活动资料。

22、解放前乌前旗奇俊峰篡权与被杀的前因后果。

23、乌中旗陈圪圪城的历史探索（原乌中公旗政府所在地）。

24、马鸿逵在磴口县抓兵要粮和各种倾轧。

## 二、经济方面

25、解放前有关河套水利的历史资料。

26、解放前河套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形式。

27、解放前蒙旗封建统治阶级对蒙、汉人民的剥削。

28、解放前河套、蒙旗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及生产情况。

29、解放前河套一带的工商业及其剥削情况。

30、解放前边客、旅蒙商在蒙旗的剥削情况。

31、解放前河套地区的租税制度。

32、解放前河套、蒙旗商会始末。

33、解放前河套、蒙旗有名的旧商号（如德和泉，三盛公，祥泰魁等）。

34、解放前河套、蒙旗的雇佣制度(如雇工、放苏鲁克等等)。

35、解放前河套及蒙旗的工业、手工业发展状况。

36、解放前河套及蒙旗地区的交通、邮电事业发展状况(包括公路、水路、交通工具及邮电事业的发展状况)。

37、乌梁素海的形成和发展。

38、营盘湾煤矿、温更煤矿、石墨矿等重要厂矿的形成和发展。

39、解放前磴口县天主教堂与地主相互勾结对农民的剥削情况。

40、解放前阿旗总管公署(亭子)和宁夏磴口县双重政权压榨下的农民生活情况。

41、磴口县大地主唐六承租大量官地转向农民残酷剥削的情况。

### 三、军事方面

42、清末、民初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套、蒙旗的驻军情况。

43、原西北军占据河套情况。

- 44、阎锡山部队占据河套情况。
- 45、傅作义统治河套时期的军事建设。
- 46、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傅作义部队的政治工作。
- 47、国民党在河套征兵(抓壮丁)的历史资料。
- 48、抗日战争时期“五原战役”的资料。
- 49、抗日战争时期“川井战斗”的资料。
- 50、清末、民初蒙旗的军事建制。
- 51、国民党统治时期各蒙旗驻军及蒙旗地方武装。
- 52、蒙旗的护路保商团活动。
- 53、解放前河套及蒙旗国民党驻军之间的矛盾斗争情况。
- 54、三十年代孙殿英四十一军在河套覆灭经过史料。
- 55、有关外蒙侵扰各蒙旗事件。

#### 四、文化、教育、卫生方面

- 56、清末至解放前河套地区的教育情况。
- 57、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河套、蒙旗设置学



校情况。

58、解放前傅作义在陕坝办的奋斗小学，奋斗中学情况。

59、解放前国民党在陕坝、临河、五原等地所办的报刊情况。

60、解放前河套的地方戏二人台。

61、解放前各种民族形式的文体活动（如：赛马、摔跤、射箭以及那达慕大会）情况。

62、解放前外国教会河套的文化侵略。

63、解放前河套及蒙旗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料。

64、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河套的戒烟情况。

65、四十年代初期河套发生鼠疫情况的史料。

66、解放前河套和蒙旗性病流行情况。

## 五、民族、宗教方面

67、满清政府在河套和蒙旗推行的民族政策。

68、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族压迫政策及民族纠纷事件。

69、解放前河套及蒙旗地区的各种宗教活动(包括：佛教、道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等)历史资料。

70、解放前天主教在河套地区的分布及其活动的历史资料。

71、解放前外国天主教神甫对河套地区人民的各种侵略和压迫(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武力的、文化的)等。

72、天主教堂在磴口县的形成、发展和政治活动情况。

73、解放前喇嘛教的封建迷信活动。

74、解放前喇嘛教寺庙的分布及宗教制度。

75、各教会有名的教主、神甫、喇嘛、阿訇、长老、修女等学习生活及各种宗教礼节、礼仪等活动。

76、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一贯道等活动史料。

77、黑暗社会生活方面：如出名的强盗、拐骗、盗墓、赌博、娼妓、妓院、地痞流氓头子等活动的史料。

78、阿贵庙、山丹庙、得布斯格庙、班禅召等著名召庙的历史撰写。

## 六、其它方面

79、自戊戌政变至解放前这一历史时期，自己亲身经历的或所闻、所见的各地区各种革命的及反动的历史事件。

80、有关巴盟地区的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文物等历史资料。

81、革命回忆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

# 封面阴山岩画说明

火鹰

封面阴山岩画，是我们在有计划地普查岩画过程中，在我盟乌拉特中旗温根公社阿斯根沟西南重山峻岭中发现的。从其内容看，是遍及阴山山脉中许许多多岩画中具有显明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一幅岩画。据考察，它是在草原民族历史上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创造出来的，那时因还没有文字，便在山石上刻、凿以便记事，所以说它是人类记事方法最早的发明。

岩画多在向阳、坚硬的山石上凿刻，虽然经历几千年历史的风吹、日晒、雨淋，画面仍然清晰可见。其内容之广泛，雕刻艺术之精美，确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史册，它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历史发展的阶段，古代战争，科学和文化艺术，民族等史实都具有重要的宝贵价值。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7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